

重庆谈判资料

四川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1945年8月25日)…………… (1)
- 毛泽东同志复电蒋介石三件(1945年8月)…………… (4)
- 附：蒋介石致毛泽东同志的三封电报(1945年8月)
-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98—1101页)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渝言论…………… (9)
- 到重庆在飞机场的谈话(1945年8月28日)
- 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1945年9月5日)
- 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45年9月13日)
- 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1945年9月18日)
- 答路透社记者问(1945年9月27日)
- 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上的演说(1945年10月8日)
- 周恩来同志在参政会茶会上的讲话(报道)
 (1945年9月18日)…………… (17)
- *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02—1111页)
- 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10月10日)…………… (19)
- 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
 (1945年8月16日)…………… (24)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 (1945年9月14日)·····	(28)
中国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1945年9月3日)·····	(31)
中国青年党对目前时局发表主张(1945年10月5日)·····	(35)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严重献言 (1945年9月12日)·····	(37)
中国妇女联谊会对时局宣言(1945年8月15日)·····	(39)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 (1945年9月6日)·····	(42)
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1945年9月)·····	(47)
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 (1945年9月10日)·····	(51)
毛泽东同志抵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 (1945年8月29日)·····	(55)
毛泽东同志参加中苏文协庆祝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的盛会(1945年9月1日)·····	(58)
建立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 欢迎毛泽东先生 ——胡其瑞等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 (1945年8月27日)·····	(62)
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1945年8月29日)·····	(64)
国共谈判的我见 ——范增年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 (1945年9月28日)·····	(66)

关于国共谈判

——《新华日报》答读者问(1945年10月1日)

..... (69)

农民的希望 (节录) (1945年10月8日)..... (74)

新时期的路标

——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1945年8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

..... (76)

蒋介石先生胥电书后(1945年8月22日《新华日报》被扣社论)

..... (80)

迎毛泽东同志来渝(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社论)

..... (84)

毛泽东先生来了! (1945年8月29日重庆《大公报》社评)

..... (87)

毛泽东到了重庆(1945年8月29日成都《华西晚报》社评)

..... (90)

中国能否取得和平(1945年8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

..... (92)

民主的政治与民主的军事不可分割

(1945年10月2日《新华日报》社论) (95)

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

——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

(1945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社论)	
.....	(98)
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	
(1945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社论)	(103)
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1945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社评)	
.....	(107)
政府与中共的会谈(1945年10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	(113)
阳光普照雾山城	
——忆毛主席在重庆	王炳南 (116)
重庆谈判.....	颜太龙 (126)
针锋相对的斗争	
——记上党大捷.....	王敏昭 (135)
一等兵海曼会见毛主席.....	美国 霍华德·海曼 (143)
一张表现友谊的照片.....	美国 爱德华·贝尔 (147)
心上挂着美国.....	美国 杰拉尔德·坦纳鲍姆 (150)
七十回忆录(节录)	张治中 (153)
杜鲁门回忆录(节录)	(168)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节录)	(177)
附录:	
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	王抡樞 (183)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警卫班的回忆	
.....	李介新 (195)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1945年8月25日)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面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

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

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5年8月25日

（原载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同志复电蒋介石三件

(一)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铤

八月十六日

(原载1945年8月21日重庆《大公报》)

编者注：朱总司令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88—1092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二)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

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养

八月二十二日延安

(原载1945年8月25日重庆《大公报》)

(三)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二十四日

(原载1945年8月26日重庆《大公报》)

附：

蒋介石致毛泽东同志的三封电报

(一)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八月十四日

(原载1945年8月16日重庆《中央日报》)

(二)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

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笱

八月二十日

(原载1945年8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

(三)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

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八月二十三日

(原载1945年8月25日重庆《中央日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渝言论

到重庆在飞机场的谈话

(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同志在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飞抵重庆，下飞机后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

(1945年9月5日)

大公报九月六日刊载毛泽东同志的谈话：“毛泽东氏昨日午后接见本报记者称：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

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边区解放区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之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实行普选。毛氏末评论中苏条约谓：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舆论仍可说话，前数日苏联红星报撰文谓中国应走向民主政治，对我两党团结寄以殷切之期望。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可勿疑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毛氏表示愿商谈早获结果。”

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

(1945年9月13日)

合众社重庆九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按照两党协议，毛氏说不能评论与国民党领袖之间的谈

判进行的情形。他说：“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是整个世界的希望”。毛氏称，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共产党领袖之一周恩来今日下午说：共产党应接受在他们区域内的日军投降。周氏说：作为国民政府军队一部分的共产党军队，如果蒋委员长下令接受日本投降，则能够受降，如果蒋委员长不指定共产党在一定地区接受日本投降，则是不公平的。毛周两人皆坚持说：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冲突。并说：共产党自许多区域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共产党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们”，并重占许多城市。

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

(1945年9月18日)

九月十八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举行茶会欢迎毛泽东同志。在会场上，毛泽东同志致词，大意说：“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也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

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答路透社记者问

(1945年9月27日)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底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答复。问题与答复如下：

(一) 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 问：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

(三) 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

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止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

生的三民主义。

(九) 问：(A) 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 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 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 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

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 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么？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上的演说

(1945年10月8日)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先生设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

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

的。（鼓掌）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于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鼓掌）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大鼓掌）新中国万岁！”（长时间的鼓掌）

（选自《为和平而奋斗》，新华日报馆1945年11月初版）

周恩来同志在参政会茶会上的 讲话（报道）

（1945年9月18日）

周恩来先生被邀起来讲话，他的讲话，是昨天茶会中最有重量、最有内容的，但是因为邵力子秘书长曾同新闻记者说明，团结、商谈期间，相约不发表经过，要我们好好斟酌，因此在这里不能详细地记下。周先生首先说明：“邵先生叫我把商谈的经过情形，向诸位作个简单报告。”接着说：“毛先生应蒋主席之约到了重庆之后，与蒋主席单独谈了很多次，两方代表也几乎天天谈，已谈了十四五次之多，牵涉的问题甚广，都是在友好、和谐、坦率空气下谈的，经过可以分作三部分。”其后周先生分①方针，②方案及③现在已得的结果三方面一一报告。说到方针的时候，周先生说：“各方面只能有一个方针，方针是确定了的，那就是胜利结束了抗战，今后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坚决避免国内战争，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不只在今天，在和平建国时期，我们亦这样的期待。国共两党要在和平合作

下建国，中国政党在和平时期，更应有长期合作。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地位，反过来，国民党也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各党的地位。这基本方针，国共两党有共同的认识，也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各党如青年党等谈过。”周先生以下所提的事情很广泛，一句话，一般有关民主及达到民主的现实问题都包括在内了。周先生的结语是：“有些已有了结果，有些已有了原则的决定，有些则尚待商谈。总之，在一个方针，一个方案之下，求得合理解决，不但是诸位关心，诸位期待，同时也是世界所注意的。我们每天都希望很快就能共同发表一个公报，使大家安心。”最后他很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必定能解决！我们的一个信念——和平建国。现在方针定了，方案有了，我们要比抗战开始时还要圆满，还要团结，以达到共同希望的目的！”他这几句话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原载1945年9月19日《大公报》）

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945年10月10日)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商谈，已获得下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

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

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

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任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

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 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原载1945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

中国民主同盟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

(1945年8月16日)

抗战胜利了，国内一切更复杂更麻烦的问题都来了，我们怎么办？假如我们在欢呼胜利的时候，能够更冷静一点，更理智一点，也许一切复杂的情形可能简单化；也许一切麻烦的情形可能轻松化；否则不是不可能演变得更纠纷更严重的。

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参加同盟的各党派分子和个人，我们自来的主张是很明确的，自来的态度是很客观的。我们不能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们也未尝不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情况可能在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最高原则之下，各各求得其适当的发展。

毫无问题，我们坚决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毫无问题，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和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的排除的。

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如何实现这八个字，我们有下面的主张十条，首先，我们要求全国的老百姓给我们以声援，请你们说话，我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不是正是你们所要主张的？其次，我们要求国际的朋友给我们以批评，请你们说话，我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不是你们也觉得这是中华民国可能而合理的出路？再其次，我们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时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主张给以充分的考虑，请你们说话，你们承不承认我们这些主张，正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呼声，同时值得你们的共鸣和赞许的？

我们承认国民党对抗战是尽了力的，同时我们承认共产党也尽了力，但我们痛定思痛，我们更承认这八年以来直接或间接为抗战而死了的一千万到三千万的人民，以及今日仍旧在饥饿线上嗷嗷待救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只有他们的功劳才是最主要的。今后一切的党派只有事事为着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叫出热烈的呼喊，请你们千万不要忽视。

下面便是我们具体的主张：

一、我们反对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但我们并不是在原则上不要国民大会，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在战争结束的一年内，在一切失地全部收复以后，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在全国和谐的气氛中实行普选，回到南京的首都，去堂堂正正开我们全国人民所一致需要的国民大会，颁宪法、举总统，成立宪法的政府！这个时期可能是明年的七七纪念日，也可能是明年的双十节，但政府一到南京，即

要积极的开始筹备，并需要有全国的各方面共同参加筹备。

二、我们主张政府以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包括各党各派的公开活动，并废止一切在战时不得已妨碍人民一切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包括特务，劳动营，以及一切束缚言论出版的检查条例。

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思想犯，惟贪污分子和汉奸不在释放之例。

四、我们主张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

五、我们主张在政治会议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裁军委员会，由有关各方面的高级将领充当委员，本公平的原则，将军队裁减到国防所必需的限度，过此人民即无负担的义务。并且应该以有限的财力，用于国家和平的建设。我们主张任何党派不得有党军，军事教育不能含有党化的成分，一切军队只能属于国家，只能用以保护人民，应精训精练使其名实相符的达到现代化。在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实现的条件下，一切军政令自然应该绝对的统一，但初步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我们并主张政府应逐渐做到使军人主军，文人主政的原则。

六、我们主张在政治会议中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我们主张自省一级开始，加强各级的自治，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均权，以促进地方事业与文化

的发展。

七、我们主张切实注意经济的复员，包括迁到后方工厂的复兴与新厂的建设，确定民营国营的标准，废除战时的统制与专卖政策，代以有计划的适当措施。

八、我们主张切实注意收复区人民的生活予以有效的救济，并扶助迁回收复区人民的复业。我们主张政府对各收复区在沦陷时所流通的货币，作一合理的收拾，其要点在使过去在沦陷区的人民不致陷于破产与无以为生。我们主张设立一收复区人民的产业登记委员会，对原有的业主予以切实的保障，并调解其纠纷。

九、我们主张政府在本年度准备征集的壮丁应立即停止，在战时所加于人民的过重负担，应即分别废止。

十、关于最近对日的和平谈判，我们主张政府应听取全国各方面的意见，并应邀请各抗日党派的领袖出席此次和平会议。对敌人所取得的赔偿，无论现款或实物，应全部用以救济因抗战遭受牺牲的人民，对抗属更应特别优待。

（选自《民主同盟文献》）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 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日前接见本报记者时，对目前国是问题，特发表谈话如下：

现在国内的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凡对国家前途具有责任感的人士或党派，都应该提出他所确定的认识和明显的主张，以求国是之早定。

中国人民因不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抗战八年，付出惨重之牺牲，博得同盟国家之协助，卒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此乃全国人民之胜利。今后民主建国的大业，任重道远，经练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使久经战事落后的中国，变成强大富庶，确为世界永久和平之安定因素，其所需要之奋斗与智慧，将百倍于抗战。

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即变为长期内战，民力凋丧，迨至抗战事起，一致对外，朝野党派均以抗战为主要任务。现在战争结束，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遇国人之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吾人深切希望当政十八

年之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把握国家统一之重要关键，由民主大道，进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工作。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不算旧账，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利害观念，而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之进行。

目前国共两党领袖正为和平统一大计，谋初步之协商，自为国人所关心，更期待其有成，惟吾人愿以下列数事奉告：

（一）吾人须明白坦率承认国民党及蒋主席担负领导抗战及领导建国之重任，但同时吾人又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苟不如此，则领导统一建国之工作，不特无由开始，而胜利之果，可反为内争之对象。前此各在野党派曾以召开政治会议（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统一政府二大主张，谋全国之真正统一，今虽战事结束，但问题的中心仍在于此。

（二）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的原则，但其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目前胡适之先生致毛泽东先生一电，其原则甚佳，但吾人亦希望国民党亦同样真正释兵权，则国家幸

甚。

(三) 吾人对于各大友邦，自然万分感谢其在抗战中的援助。但今后吾国进入民主统一建国的阶段，吾人所希望友邦的协助不在军火的供给，而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

(四) 日本虽败，但报复之念甚切。所谓“勾践灭吴”之故事，日本侵略者知之甚稔，吾国人民必须警惕。吾人并要求同盟国家勿存姑息政策，应彻底毁灭其侵略的基础。至于汉奸伪军问题，尤须彻底解决，不可姑息，不可利用。凡此等人物皆民之莠者，莠如不除，良何以安？

(原载1945年9月14日《新华日报》)

中国国民党

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中央社讯〕中国国民党发表《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简要如下：

全国同胞们：

当此抗战胜利，全国腾欢，想能记忆国父一句名言：“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这句语，在胜利的今日，更觉得如响斯应，论建国的前途，更好似耳提面命。

首先是本党遵照国父遗教，领导国民革命，争取中国自由平等，今已在我同胞共同奋斗之下获得成功，而在这一成功之中，确已实现了“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即不幸中国为日本所占领，不论何时何处，亦断非日本所能统治而有利”的遗教；更实现了“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的遗教。

国父曾指出：“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

张，则中国或几乎息”。五十年革命历史，八年余抗战纪录，都说明了本党的努力奋斗，与中国存亡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国父也指出国民革命是国民之事，人人应负革命之责，我同胞今后自更当记取国父的教导，自强不息，为建国大业成功的保证。

其次国父创立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为立国的极则，政制的宏观，今不平等条约的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复灭，民族主义中“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个目的，已完全达到。其第二个目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亦可遵奉遗教及六中全会决议，促其彻底实现，尚待迅奋策进的，即是最进步的民主政治，最适宜的经济建设。此为本党目前最急的任务，亦为本党始终一贯的决心，誓当与我同胞一心一德，再接再厉，使民权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完全实行，民生主义亦能定期成功。

再次，革命维新兴邦建国成功的前提，厥在先知先觉者揆情度理，决志进行。国父既由此倡率同胞共成开国之功，本党总裁亦将由此辅导同胞共成建国之业。

最后，国民革命必赖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才能完全成功。国父远在同盟会宣言中，已说明国民革命的意义，在人人皆负革命的责任，政府不过是领导的机关，政府的功绩，即国民的功绩，后在其遗嘱中又指示本党，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本党领导抗战未敢稍忘遗教，我同胞亦在八年多的长期抗战之中，出力出钱，不怨不懈，造成今日胜利，在首都沦陷以后，本党要求我同胞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同胞即在各级民意机关之中，捐弃成

见，破除畛域，贡献胥慰，以利抗建。在国际形势不利于我之时，本党要求我同胞更要本着过去自力抗战的精神，准备迎接最恶劣凶险的局势，我同胞即恪遵告诫，不因为局势的险恶而气馁。在不平等条约取消，友邦既与我并肩作战之时，本党要求我同胞勿骄勿怠，愈勉愈奋，必须认识惟自强，乃能获得真正之自由，惟自立始能求得真正之独立，我同胞即能自勉自重，不存微倖依赖之心，避免自怠自弛之失；特别是沦陷区域的同胞，虽然朝夜受敌伪的鞭笞、烧杀、奸淫、掳掠，但常能秘密接受最高统帅的命令，衷心服膺本党的主义，探报敌伪的计划，摧毁敌伪的布置。其次亦能不为敌伪屈服，不受敌伪利用，宁牺牲身家性命于无可抵抗之下，决不稍亏损我民族忠义大节。至于我全国数百万将士，又都来自民间，无不为忠勇特著的同胞，无论作战如何艰苦，给养如何不足，总能接受最高统帅与全国同胞的要求，牺牲一身，转战万里，以劣势的装备，抗优势的大敌至八年之久，卒能获得今日的战果。海外侨胞，虽遭浩劫，或仍留原地，与敌伪奋斗，或遣归祖国，效忠抗战。凡此难能可贵的志行与成就，实由于我们同胞能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能尽忠国民革命的责任。而国父“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的教训，乃被我同胞在此次抗战之中，使之成为事实。本党饮水思源，愿竭诚对我同胞表示，抗战中一切力量，皆为我同胞的力量，一切成功，皆为我同胞的成功。

惟抗战虽已胜利，任务仍未完毕。目前急待共同进行复员，最近必须完全实施的宪政，有许多大事要做，关于前

者，要为军人布置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需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前路。关于后者，要加紧完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迅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凡此种种，尤必赖我同胞应用抗战时期的宝贵教训，一以贯之，于最后一程的建国。抗战既由舍小异，祛私见，而解决战时问题，建国更应尊重统一，避免分裂，以开阔建设的坦途。抗战既由自助而得人助，建国更应各尽其力，以求得国际的助力，甚愿我同胞记取前训，共图全功。

同胞们！御侮救亡的大战已获胜利，富强康乐的国家，自由和平的世界，正照耀在我们的眼前，但非惨淡的经营，同向前进，便无由实现。本党无日不迫切望归政于全国同胞，即欲我全国同胞共负建国的重任，共成建国的大业，一举而实现国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建设必自民始”的遗教。我们同胞必是能够不关矜，不懈怠，把握时机，共当大任，本党一定能和我同胞邪许同声，苦乐共尝，共同建设成功一个民族平等，民权畅行，民生乐利的中华民国。本党信赖我同胞今日以后确能使建国必成，亦同于信赖我同胞，今日以前的能使抗战必胜，我同胞信赖本党今日及今后诺言的必能实现。国父说：“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本党与全国同胞此种共信互信心理的交织，实为今日抗战获胜的主力，今后建国必成的左券。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幸共鉴之。

（原载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

中国青年党

对目前时局发表主张

抗战胜利，已近两月，国内一切问题，尚纷如乱丝，国际危机潜伏，不能协调之点甚多；在在足以影响中国。本党适于此时，有在川中委会之召集，曾就目前形势，作多方研讨，就其结论归纳为主张十条，兹特敬谨提出，请国人指教：

（一）从速召集建国会议（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其权限不必动摇国民党之领导地位，但必须是以解决问题，其名额与人选不必拘文牵义，但必须顾及各方之实现，并转得举国一致之信赖。

（二）国民大会之召开，须在政治会议作详密之协商，以期不背公平合理之旨 而收团结统一之效。

（三）切实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宜普及全国。

（四）救济全国人民为目前第一急务，宜遴选各方公正人士，与救济机关密切配合，以安抚人心而加强其向心力。

（五）中央与地方之用人行政，宜破除成见，一本惟才惟贤之旨。

(六) 严惩汉奸，肃清贪污，为刷政治之张本。

(七) 解散伪军，裁汰冗兵，为全国大举整军的初步。

(八) 挽救目前工商界危机，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恢复交通，为安定民生的要着。

(九) 改进教育，须从能使教师自由讲学，学生安心读书做起。

(十) 加强对美苏英法之平等合作，以公正态度，消弭其相互间可能发生之困难，并积极参加联合国机构，以共为世界和平，防止日德等侵略国之再起。

三十四年十月五日重庆

(原载1945年10月7日《新华日报》)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 发表对时局严重献言

在这艰苦抗战的八年中，我们这组合的成员每一个都分担了这个时代所给与我们的苦难。严酷的双重压迫，民族的侵凌和政治的迫害。我们忍受了这一切，我们不曾申诉，也无从申诉，所谓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并没有一个我们自己推选的代表；而特务横行，偶语弃市，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没有丝毫的保障。这种种的灾难苦厄，我们勉予忍受，都只是为了抗战，为了胜利。

现在，抗战胜利了，法西斯已经溃败，民主的潮流正以排山倒海的势力激荡于世界，而盟邦的团结也日益巩固，这正是我们从事建设民主工业化新中国的一个伟大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和平团结，需要民主统一，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经济建设，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与文化水准。这是经济界历尽苦难后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反之，任何妨害民主和平的行为，都非我们经济界所愿见，也一定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所反对的。

在这个大时代的转捩关头，我们不忍缄默，以极沉痛的

心情，提出我们的意见，就正于国人。

我们主张：

(一) 一切国事，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二) 立即取消因战争而立的法令和各种不合理的捐税与摊派。

(三) 立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以舒解工商业八年来的痛苦，并使民间企业得以自由发展。

(四) 立即停止抽调壮丁，以安定工商界从业员工的工作。

(五) 严惩工商界附敌汉奸，并没收其工厂、矿场、船舶、银行，由后方实业界代营，以补偿其因战事所受之损失。

(六) 严禁敌国人员及汉奸在复员期窃占国内各种事业上之主干地位，以平公愤。

(七) 政府对于随胜利而来之工商业危机，应予切实救助；从速开放低利贷款并收购产品履行既定合约。

(八) 政府对于目前因经济衰落而失业之职工，应立即予以救济，维持他们的生活。对于接收敌伪经济事业及各地复员时，尤应优先尽量任用后方工商各业的从业人员。

(九) 政府对于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之复员返乡，应予以舟车航空交通上之便利。

(原载1945年9月12日《新华日报》)

中国妇女联谊会时局宣言

由于中国人民八年多不屈不挠的战斗和盟国最近的加紧进攻，特别是苏联对日宣战后百万大军的猛烈挺进，使日本强盗终于不能不向盟国请求无条件投降。八月十日晚上，全世界都被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狂欢所沸腾。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轴心国家终于倒台了。过去，我们庆祝同盟国打垮德国的捷报，今天，我们自己也得到了庆祝对日抗战胜利的时机，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成果，我们应该庆祝，应该狂欢，但是这只是胜利的开始，不到国境内的敌伪全部被解除武装，束手投降，是不能算抗战已经结束的。我们要警惕敌伪最后的狡计与顽抗，我们要拿行动完成这最后的一役。任何对敌伪戒备的松弛与宽容，都是对沦陷区同胞和为抗战牺牲了的军民的侮辱与背叛。

抗战的彻底胜利应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彻底消灭东方法西斯及其任何凭借，另一方面是必须保证战争胜利的果实属于人民。中国这多年来忍辱负重和不顾一切的英勇战斗，惨酷牺牲，主要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

国家，因此也绝不容许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仍然停留在分裂、落后、不团结、不民主的局面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方面是如何巩固彻底的抗战胜利，另一方面则是怎样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去和平建国。

无可讳言，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途中还有许多暗影，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政治还停留在一党专政的阶段里，和在这个前提下所产生的内战危机。不久以前陕甘宁边区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更使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意识到这一危机的严重。如果在抗战已经胜利的时候，还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此后的问题，将是更不堪设想。

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妇女，在抗战中已支付了最大的代价，我们有权利要求在战后享受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不愿在抗日胜利后，再有任何战祸发生，削弱建国的力量，和使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再充当屠杀自己同胞的凶手，或在自己同胞的枪炮下牺牲。我们怎能容忍在已获得和平后，还被抛进贫困、饥寒、死亡、压迫里。

为了要达到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目的，为了要完成中国妇女彻底的解放，和男子共同参加建国，我们要求：

（一）全国抗日军队不分派系的共同彻底解除敌伪武装，严厉处置战争罪犯；不容任何法西斯余孽复苏，不容任何多年来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伪军汉奸有改头换面的机会，保障国内国际的永久和平。

（二）全国同胞必须警惕那些企图独占抗战成果的人们

发动内战的阴谋，并且应该用全力加以反对和制止。

(三) 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公正人士举行紧急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组织举国一致的政府，积极从事各项复员工作。

(四)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

(五) 立即废除一切战时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实行民主措施，取消特务组织，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

(六) 取消一切战时赋税、兵役，减轻人民负担，给残废军人及所有抗战军人的家属以生活的保障和一切优待，给回家的同胞，特别是抗属，以一切便利。

(七) 实行保障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及文化教育上与男子一样平等。

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应当自己组织起来，扩大和加强民主运动，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民主团结与和平建国的早日实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光明或留在黑暗中蹉跎的转折点。虽然民主胜利终会到来的，然而我们人民无畏的威力是会使它更早降临的。

天已经亮了！我们愿和全国的同胞共同高呼：

抗战胜利万岁！

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万岁！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原载1945年9月5日《新华日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

当全国人民用狂热，用笑泪并发的感激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的今天，本会谨以全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名义虔诚地宣言：

光荣属于前线坚持作战，忠贞无私的将士们，向他们致敬！

光荣属于在敌后不屈不挠，使被污辱了的广大土地英雄的站了起来的战士和人民，向他们致敬！

光荣属于用巨大的力量参加战争，因而最后致胜了的盟邦和她们的忠勇的将士们，向他们致敬！

光荣属于为保卫祖国而倒下了的战士们，向他们致敬！

光荣属于为保卫祖国而流了血，成了残废的战士们，向他们致敬！

光荣属于为支持抗战而出钱出力，忍受了重重困苦的广大的劳苦的人民，向他们致敬！

向那些献出了父、兄、子、弟和丈夫的千千万万的抗属致送吊唁！

向那些被敌人残杀了的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致送哀悼！

向那些遭受了敌人的压迫和污辱的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
致送慰问！

向那些不愿作顺民而颠沛流离的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致
送慰问！

• • • •

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欺辱中华民族超过了半个世纪，全
面地用武装暴力侵占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又超过了八
年，终于被中国人民的坚强战斗和盟邦的巨大力量所击倒而
屈膝投降了，这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胜利。

争取到了这个胜利的，有两方面的力量，一是中国人民
的解放志愿，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要求。人类历史发展到了
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时代的今天，不能容许帝国主义的猖
狂，不能容许法西斯主义的存在，经过了百年来的艰苦斗争
而掌握着致胜武器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做殖民地的奴隶，不
能再安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中国人民抱着这样的信念支持住了艰苦的战争而日益
强壮，中国人民也凭着这样的信念来迎接胜利而普海狂
欢。

但本会郑重的指出，在庆祝胜利的今天，甚至在得到胜利
消息的那个沉醉的瞬刻，人民的心里依然波动着一股焦虑甚
至笼罩着愁云，人民有痛苦的负担，人民有深沉的愿望，当胜
利突然来到的今天，严重的问题依然严重地横在前面，未来的
远景既没有被勾画出来，现实的困难不又见解决的保证，

就无法不在狂喜的同时感到焦虑，感到茫然，甚至感到悲怆了。

本会认为：所谓胜利，决不应该是回到战前的原状，现在世界史的趋势不能让中国停留在非民主而混乱的状态里面，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战斗愿望正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而富庶的国家，抗战八年以来的伟大的锻炼和发展已经打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现实情势的困难和复杂又非马上实现民主政治就要引起严重的危机，所以，在全国人民殷切待望，时机迫切的今天，本会敢诚恳地提出处理国事的三大目标，曰团结，曰民主，曰和平。这是全国人民所祈望的目标，但它们的祈望能否实现，又以民主政治的能否实现为中心。本会要求一切政治力量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并且要求马上采取最有效的步骤来确定实现的日程。要这样才能够一方面消灭全国人民所忧惧的内战危机，实现全国人民所期待的百年建国大计，使人民的愿望有所依附，另一方面使紧急的复员复兴工作，例如疏散还乡，招抚流散，抚恤伤亡，安靖地方，解除民困，振兴文化，重建以至发展产业等等，依照着建设大计和人民利益合理地达到，不至造成一片混乱，更加增大人民的失望和创伤。

本会指出，紧急的时机不应放过，人民的愿望不应无视，国家的大计不应拖延。无论在朝者或在野者，凡是能够推动或阻碍这个伟大事业的人士，都应该知道，现在正是处在人民的迫切的期待与严厉的监督前面。

至于凭着民族大节和千千万万的战死者死难者的名义，

要严格的惩治使中华民族蒙受了耻辱，使中国人民加重了灾难的汉奸，不使他们再有欺蒙或损害人民的机会，凭着全国人民几十年以来所抱的愿望和抗战八年以来所忍受的苦难，彻底取消一切束缚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法规和机构等具体措施，更是不容再缓，应该在此时此刻立即实现的了。

最后，本会郑重地指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用壮烈的战斗所筑成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面，文化思想工作不但用传教的精神尽了先导的任务，而且用殉道的精神参与了血肉的斗争，这在八年以来的抗战过程上面表现得特别明显。本会凭着一切先贤先烈和无数的同道者的名义发言，对于一切束缚文化思想的阻力提出谏言，而且，在文化思想的真实要求上面，本会认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但这决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生的功成事毕，而是中国人民开始跨进了创造光明的民族事业的第一道门，要能够执行这样的伟大事业，首先得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武装机构和它的社会基础，得认真地改造混乱而贫困的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这就非得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和信心，非得是一个体现着团结、民主、和平三大目标的国家不能够完成。

只有是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痛苦和牺牲才不是白费，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才不会落空。

只有是这样的国家，才能够不愧对伟大的盟邦的帮助，才能够和盟邦互通有无，彼此都能得到幸福和繁荣。

只有是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创造子孙万世的幸福大业和

巩固世界的永久和平。

经得起痛苦考验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

经得起痛苦考验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民主，和平，繁荣，强大的新中国万岁！

世界的民主大家庭联合万岁！

(原载1945年9月6日《新华日报》)

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

随着日寇的无条件投降，八年余我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血汗所坚决争取的胜利，终于在美苏英等同盟国协力合作之下到来了，甲午以来的血海深仇，从此得以清债，七七以来的民族巨创，从此得以调补。全国同胞方为自己空前的牺牲得到了应得的代价，为国族命运透露了万丈的光芒，而欢腾庆祝，却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在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话刚吐出口而还没有放下武器的时候，内战的阴霾刹时密布了全中国的天空，把刚透露出来一点幸运的光芒，又立即遮蔽起来了，这怎能不令人忧惧？怎能不令人战栗？

据我们所知，内战的阴霾，实际上并不自今日始，而是抗战以来，尤其是近五六年来一直存在着没有消散过的。并且不单是内战阴霾，且还不断有内战的事实。不过最近这种可怖的阴霾更为浓密，这种骇人的事实更为扩大罢了。若要问为什么这种违反人民的意志，而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内战企图会经常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根源存在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存在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没有说话、组织、

行动、身体及参与政治、指挥政权等权利的事实，换句话说，内战的根源是存在于政治上缺乏以人民大众为主人的民主制度，存在于国家的政权一直为一党的少数人所把持。由于实际上专政代替了民主，制造分裂代替了和平团结，距国家统一的目标，就愈来愈远，因此，愈是高唱建国，愈使国家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

可是今天全国人民所抉择和坚持的道路，正如中国民主同盟所呼吁的，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道路，这不祇是全国人民主观的要求，而且也是使中国成为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国家的惟一可能的客观途径。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实现全国的团结，只有实现了民主团结，才能完成真正的统一，同时也只有民主统一下的和平，才能保障新中国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唯一的客观真理，也是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任何人违背了这一真理和要求，他的生命就非断送在历史的巨轮底下不可。

我们成都文化界人士，对于国事的主张一向是如此。抗战八年来，我们对于坚持民主团结和平进步这种主张，和根据这种主张在文化岗位上所做的斗争，从来不敢后于国人。今当日寇投降的话才吐出口，大部分国土尚被敌伪大军全副武装占领着的时候，我们耳边所听的，不仅有爱敌伪亲敌伪的号召，而且还有爱敌伪亲敌伪的事实，公然请敌寇“维持治安”，借伪军“收复失地”。反之在敌人接受招降四星期的今天，我们却没有听到过一字一语关于惩处战犯，惩办汉奸，解散伪军这一类的命令和声明。而内战的危机已经到处在爆发，到处在扩大着了。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为民族命

运，为国民生计着想，真不能不忧心如焚，毛骨悚然，同时当局对于全国人民一致呼吁的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权，实现一切民主措施等要求，则一再拖延或竟置诸不理，使我们不禁大感失望。言念及此，我们感觉抗战虽已胜利，国家命运却反而愈见其茫茫。

最近，毛泽东先生等已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我们听了十分欣慰，但是这一谈判只有在民主和平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收到美满的结果，我们成都文化界同人，和全国大多数同胞所呼吁的一样，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制造分裂，尤其反对假借敌伪之手来进行内战。我们认为要挽救当前危机和奠定国家百年大计，必须立即实行以下种种措施：

一、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领袖的政治会议，由此产生举国一致的临时政府，并加速筹备全国人民普选的国民会议，以便早日产生正式的民主政府。

二、无条件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权利。

三、立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之自由。

四、废止一切束缚和剥夺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如特务机构，劳动营制度，战时新闻图书审查条例，非常时期人民集会结社法等。

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颁布明令，严惩一切汉奸，解散伪军，反对以

维持治安为名，假借敌伪武力以挑起内战的一切企图。

丁 诚 丁涪海 方 然 方 菁 李劫人 沈志远
余所亚 马思聪 姚雪垠 常燕生 常冰容 陈觉玄
陈白尘 陈翔鹤 许寿真 张天翼 张先辰 张志龢
张洋兮 叶圣陶 杨伯恺 杨 槐 刘洛芷 刘开渠
谢文炳 谢 逸 庞薰琴 苏 敏 罗念生等248人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原载1945年9月29日《新华日报》)

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 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

全国各界同胞们！

日本投降条约已在九月二日正式签字了！八年来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的结束了！多少年来的耻辱与压迫已清算了！和平建设的日子已降临人间。这的确是中华民族一个空前伟大胜利的日子，在这日子里，怎叫人不高兴、狂欢，和热烈的庆祝呢！

抗战是一个神圣艰苦的工作。八年来，中国人民茹苦含辛，牺牲一切，在敌人残酷的进攻下，坚持抵抗，用自己的血肉，粉碎了敌人的迷梦，奠下了胜利的基础，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伸张正义，歼灭强权。现在胜利终于来到了，一片灿烂的曙光已展开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功绩，我们今天应该伸出双手，热烈的迎接这伟大不朽的胜利。这胜利是我们的，这胜利将引导我们到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都这样相信：这新的时代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团结的，无论在国际国内都是如此，因为和平民主是我们这

次对法西斯作战的目的，而团结则是使这次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今后我们要和平建设新中国，民主、团结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就国际方面看，我们相当乐观，由英美苏三大国领袖的历次会商，联合国的几次集会和这次划时代的中苏友好盟约的订结，使世界上主要的强大国家团结起来，摧毁了曾经猖獗过一时的法西斯暴政，并在积极阻止其再生，而使今后世界的和平民主有了强固的保障。说到国内，我们决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中国还存在着许多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的危机，直到今天，敌人的军队，还没有在中国境内完全解除武装，汉奸国贼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罚惩，反而正在计划伪装自己，想摇身一变而为“曲线救国”的英雄，借以保留其法西斯余力，企图再起，扰乱和平。在政治上，民主设施还未见端绪，国共两党关系还没有合理解决，有些专制主义者，还在想打内战。至于由于战争的过重负担，以及在战争中由于通货膨胀及发国难财者所造成的经济紊乱，民生凋蔽，更是万分严重。而接受沦陷区，建设新中国问题更多。这许多现象与问题，如不能妥善协商，合理解决，则中国前途实不堪设想。然而，我们也确切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主，则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一定可以做到的。现在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已来重庆与蒋主席会商，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而全国人民的要求，亦正是如此。我们除开对这次谈判明确表示我们的态度，认为国共两党应该竭诚相见，以人民利益为重，采用公开方式，邀请其他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参与协商外，我们更

应正视现实，贡献出一切力量，为这次谈判的圆满解决及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里我们提出我们的主张：

（一）依据波茨坦宣言，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其再生，以维护世界和平。

（二）严厉惩办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汉奸走狗。

（三）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根据各地人民意愿，选派各地方官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四）立即组织联合统帅部，解决军队统率问题，使各地真正抗日部队，就目前驻防地区，从速分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失地。

（五）切实优待嘉奖抗日军人，抚慰阵亡将士家属，停止征兵，并从速办理复员。

（六）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有效帮助一切有利民生的民营工商业，以奠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要解决今天一切问题，真正展开建国工作，决不是空谈高调，口是心非，对付拖延，阴谋欺骗所能为功，必须痛下决心，根据人民意愿，从现实问题着手，寻求解决之道，以上六点实为我们衷心的要求，亦为全国人民的意愿，我们郑重提出，希望全国各界同胞以从事抗战之伟大英勇精神，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陆祖荫 施仁套 张昌明 李公朴
光未然 章 泯 夏康农 郑伯华
陈钦墀 潘大逵 尚 钺 罗隆基
李何林 宋云彬 孟 超等六百二十八人
三十四年九月十日

(原载1945年9月26日《新华日报》)

毛泽东同志抵渝 商讨团结建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在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到达。到机场欢迎的有蒋主席代表周至柔将军、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诸先生，和中外记者几十人。毛主席下机后，并应中外记者之请，和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志等摄影和拍制电影，后来就坐车到张部长公馆小憩。晚八时，蒋主席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洗尘，并邀美大使赫尔利，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周至柔等作陪。

（本报讯）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昨天上午本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了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毛先生来了！这一下好哪！”好多公务

员、军人、学生热烈的向营业部的同志们握手，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象征着和平、团结与光明。

下午一点半，九龙坡机场已经很热闹了。外国记者们欢迎了巴丹之战的温锐特将军之后，就不断地打听延安专机的消息。邵力和雷震先生来得很早，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和中国记者，张表方、左舜生、章伯钧、谭平山……先生都到了，新从苏联归来的郭沫若先生和夫人也赶来了，沈衡山先生快活得象个青年，听说他昨天听到了消息，就一直兴奋到不能休息。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主席派了警卫组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场负责人报告专机在十一点半由延安起飞，计时三点可到重庆。

一架标名“美国姑娘”的银色飞机下降了，人象潮一般的涌过去，可是美国同业们知道这不是赫尔利大使的专机。三点三十分，两架飞机渐渐的接近了，在低空盘旋了两周，机身上的一颗大五角星也可以看到了，休息室里人奔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一片……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下机，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外国记者喊了：“General Ohowl”“站近一点，大

使先生”！

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的确，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的向欢迎者含笑招呼。人们包围拢来，七月间去过延安的五位参政员是异地重逢，其他各位也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介绍一一交换了热烈的握手。新闻记者开始自我介绍，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谈话。

四点正，一列汽车从机场出发，路上的市民很敏感地感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来了。”有人向汽车挥手，每人都是带着欢喜和仰望的笑容的。

赫尔利大使一直把毛、周、王三位送到曾家岩张部长公馆，小憩之后，就回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休息。

（原载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

毛泽东同志参加中苏文协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盛会

本报特写 下了一场夜雨，山城已经是已凉的时节了。中苏文化协会孙邵两会长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昨天下午七时在会所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鸡尾酒会，同时还举行了苏联各民族友好的照片展览预展。下午六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的街上就挤满了人，各式的汽车一辆辆的停下来，苏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罗申武官、孙夫人、孙院长、冯焕章将军、覃理鸣副院长、翁文灏副院长、邵秘书长、王世杰部长、陈辞修部长、张治中部长、鹿钟麟部长、梁寒操先生、朱家骅部长、陈立夫部长、吴铁城秘书长、贺市长、沈钧儒先生、马寅初先生、左舜生先生、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谭平山先生、王芸生先生、冯夫人李德全先生、王昆仑先生、许宝驹先生、张申府先生、高崇民先生、史良先生、曹孟君先生、刘清扬先生、贺夫人倪斐君先生、茅盾先生、侯外庐先生、张西曼先生、阳翰笙先生等，和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三百多人，一个个准时到会了。这样的集会，在战时陪都是常有的，可是，今天的情景却显得并不平常。天

下起细雨来了，可是人和汽车终于越聚越多的拥塞了这带斜的坡道。六点半，几千市民几乎把交通都阻塞了，交通警察和宪兵忙着维持秩序，傍晚的街头充满了汽车喇叭和市民们兴奋地谈话的声音。

人们千万双眼睛盼望着毛泽东

今天这个会的意义是重大的，可是今天因为一个人的参加，而更显得重要了。几千双眼睛望着中苏文协的大门，几千个人谈论着一个人的名字。“毛泽东！”“今天毛泽东要来参加的。”报上没有发表消息，举办者方面甚至于守口如瓶地保守秘密，但，这千余的市民终于在细雨中停下脚步了。“什么，毛先生要来参加？”一位老公务员模样的人向他同行者问，脸上浮出笑容来，“瞻仰一下丰采吧”。挤到文风书店屋檐下站定了之后，感慨地说：“咳，毛先生啊，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了。”

中苏文协二楼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是一片欢笑的声音，一片期待的眼色。全陪都的知名之士，党政军要人，文化艺术界人士，都聚会在这今天特别显得狭窄的屋子里了。这一边孙夫人在和郭沫若先生握手，那一边陈立夫先生在和孙院长碰杯，是冯焕章先生洪亮的笑声，是谭平山先生风生的谈笑，彼得罗夫大使忙着和已知未知的朋友们招呼，当主人的孙哲生先生今天是满面春风。准七点，楼下一片哄动，多少双眼睛望着大门的入口，在一片鼓掌声中，大家待望着的毛

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会了。

大家紧随着他，楼下的人一起的拥到楼上来了。数不清的热情的握手，洋溢着真情的招呼，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手，立刻跳跃地回到她妈妈的身边，骄傲地说：“妈，我握过手了。”

和平民主团结的象征 二十年前的老同志握手

在毛泽东同志脸上，是欢喜和感动的表情。当覃理鸣先生和他相见的时候，紧握着手久久说不出话来，终于眼圈红润，流下泪来了。这是一个何等动人的场面啊，今天集合在这儿的不是有许多民国十三年时代的老朋友老同志吗？冯焕章先生两手握住了毛泽东同志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来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毛主席兴奋地干了杯，瞧，冯先生不也已经悄悄地用手帕在擦眼泪了吗？谭平山先生是在九龙坡飞机场已经见面过了，今天还象是初见似的热烈的握手，干杯，……今天的会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民十三年的老同志重新在一起握手言欢，相互问好，“三大政策”的精神洋溢着今天的会场，多少人在怀旧，多少人在期待着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啊。

正厅正中挂着中苏两国的国旗，在这辉煌的国旗前面，苏大使和毛泽东同志握手了，“干杯”！为了中苏两大民族的友好同盟，为了新中国的和平建设。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在各室巡历了一周，每个人都向他举起了衷心祝福的干杯，毛主席脸上已经泛起红晕了，冯焕章先生说：“今天，您会喝得躺下来的。”时间飞一般的过去了，为了晚间八时还有吴秘书长铁城的约宴，毛主席只能向大家告辞了，“有机会再谈谈吧”，“一定要的”，“真是，老朋友二十年不见了。”人们用恋恋不舍的感情目送着他，又是一连串的握手，许多人一直送到门口，旁边听见一位作家在对一个朋友说：“你的眼好贪馋啊。”

薄暮的门口还是挤满了人，“来了，来了，”毛主席上车的时候，门内外的人齐声鼓掌了，“毛先生”，“欢迎欢迎”！人象潮一般推动，“毛先生，欢迎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着团结、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声！

（原载1945年9月2日《新华日报》）

建立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

欢迎毛泽东先生

——胡其瑞等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

编者先生：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对于将来的复员、建设，还是惴惴不安，是不是很快地可以把敌人的武装解除？很快地我们就可以享到和平幸福？工业家能否把敌伪的工厂接收过来？商业界目前亏累破产的惨状能够得到挽救吗？种田的，能不受土劣的欺侮？工人生活能否得到保障，而安心努力生产？文化教育人士能不能获得言论思想的自由？这一切都可归纳成贵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求和平团结和民主。

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是反映和代表了老百姓的要求。希望即将开始的谈判完全成功，希望立即出现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中国的国土上实现和平与民主。这才不负毛先生一行，不负全国老百姓的愿望。毛先生之来，是关系全国命运

的大事，我们谨表示热烈的欢迎。

读者 胡其瑞 刘冠平

肖长虹 鲜 群

八月二十七日

(原载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

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

亲爱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领袖：

听到您来到了重庆的消息以后，我们真高兴得不晓得怎样办才好。大声的欢叫吧，别人会干涉我们的，关在心里头不讲吧，又觉得闷得不好过。我们只好悄悄地躲在宿舍里，几个人面对面地傻笑一阵。

毛先生，您觉得我们太幼稚好笑吧？请您不要笑我们，好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老是被别人当牛马看待，一点起码的自由也没有。我们老是想，我们不能这样永远过下去，我们会遇到救星的。从报纸上，从许多好的朋友的口中，我们晓得中国人有了一个大救星，这个救星就是您。我们欢迎您来，我们拥护您提出的主张，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希望。

是您，告诉中国人民怎样才有把握打败日本鬼子；是您，帮助中国人民想办法来一个大翻身；是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真正的和平与团结的希望。您到底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快乐，我们怎能忍禁住自己的快乐的感情呢！

我们真不晓得怎样办才好，只能写这封信给您来表明我们对您的尊敬和感谢。

我们虔诚地祝福您。

一群女工 林 华 吴素贞

江莲贞 胡 波

张德芳

八月二十九日

（原载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

国共谈判的我见

——范增年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

编辑先生：

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个渴望和平的我，实在是万分焦急。和我同感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今天打开贵报，看到谈判停顿的消息，真教人忧心如焚。毛先生到重庆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谈不出一点眉目，是什么东西在其中阻梗着呢？

这几天，重庆市上，关于谈判，传说纷纭，各种各样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但把各种传说对证起来，也似乎可以寻到一点脉络，可以见到一点谈判所以未能成功的症结所在。因此，我愿意贡献几点意见，以供谈判双方的参考。我们知道，国共谈判，并不是国共两党的问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问题，作为国民一分子的我，提出我的意见，实乃义不容辞。

我的意见是：

第一、谈判双方要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是用不着解释的。两方对谈，如果两方都无诚意，谈判当然不会有结果；

即使一方有诚意，一方没有，谈判也不会有结果。毛先生亲自来渝，再三表示中国无论如何必须求得和平，他的诚意，我们已可以从他的言行上窥见。我们希望两方面都能够为百姓着想，以百姓之利为利，以百姓所恶为恶，真心诚意，以求得苦难中国的老百姓所长期酷望的和平之实现，则一切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第二、谈判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注重客观的事实。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来尊重客观事实，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关键。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国共两党，无论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有甚大力量，任何一方要想无视对方，抹煞对方，都必陷于重大错误。倘若一味主观将事，强不可为而为之，一念之差，即可陷中国于可怕的“内战”祸患中，过去十年内战的惨痛教训，至今犹深印人民脑中，何况现在的情形更是不同了。这两个不祥的字眼，大家一想起来就讨厌。但讳而不言是没有用的，应该用实际的努力来避免它。最重要的，就是要谈判双方互相重视对方的实际情况，照顾双方的利益和困难，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我们说过，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两党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的问题，因此，谈判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实际上，求取和平，亦即为全国人民的福利。进而言之，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要求，不论那一方提出，对方即须无条件接受，决无拒绝的理由。老实说，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是国是共，向无成见，他们只问谁是对他们好，是为他们谋利益的。他们也不了解书本上的三民主义，但他们却懂得实际生

活中的三民主义。如果一方面用绳子捆着他，一方面却对他讲民主，那是骗不过他们的。抗战胜利了，人民必须得到必需的自由，民主必须实现，特务机关必须解散，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如果双方都能够从人民的这个基本利益出发，谈判就一定成功。

我以为，这三点是谈判的最基本原则，是否有当？尚希指教。

此致

编安

范增年敬上

（原载1945年9月28日《新华日报》）

关于国共谈判

——《新华日报》答读者问

慕秋先生：

来信收到了。从这信中，我们充分了解你对于国内时局的关心、忧虑和希望。和你同感的人，一定很多。你的问题，也正是许多人都想得到解答的，因此，我们很愿意尽我们的力量说一点意见。

关于国共谈判的具体情形现在还不能详细的说。你问：前些时候传说即将发表公报，是不是事实？是的。在前一个星期，谈判已达到一个相当的协议，双方决定就要发表公报了，却又忽然发生变卦，使发表公报这件事搁浅下来，连谈判也停顿数日。可见要求得和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已经发生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困难会要发生。

你说：在你的同事中间，有些人把国共谈判看成是两党之间互争权利，因此，他们得出悲观的结论，说谈判是不会成功的。你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共谈判所争的是民主与非民主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能否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和中国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能否保持的问题，诚然，你的看

法是很对的。正是因为这样，谈判才分外困难，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决非私党私人之争可比，它的性质重要得多。但也正因为这样，不管在谈判中遭遇多大困难，那些困难都必须克服，因为和平建国是全国人民所要求的，中国只需要这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毛泽东同志在答复路透社记者问中，已经明白地表示他争取和平、避免内战的坚强决心。

如果了解了国共谈判的这个基本关键，对于谈判中间的重重困难就不会惊奇了；既不会空洞的乐观，也不会徒然的悲观。譬如唐僧取经，途中要经过多少困难障碍，他原是早已料到的，所以他决不见难而退，但也决不粗心大意，上那些妖魔所变幻出来的美人女色的当，只有那糊糊涂涂的猪八戒，才是看见困难就想开小差，看见蜘蛛精变成的女人在池子里洗澡，就赶紧跳下去。争取和平、争取民主，要比唐僧取经更困难得多，空洞的乐观是要不得的，但也用不着悲观。困难要靠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去克服，而且一定能克服。我们的“经”——和平、民主，一定要取得，一定能取得。因为我们也象唐僧一样，有“神”帮助我们，不过，我们的“神”不是幻想的迷信的产物，而是实实在在的最强有力的有求必应的“人民”！

你告诉我们，某些人正在散播一种破坏国共谈判的歪论：什么共产党没有诚意哪，共产党要军队要地盘哪，共产党反对还政于民哪……诸如此类，其实都是唱烂了的老调子。毛泽东同志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已经把这些歪论扫得干干净净。

在那里，毛泽东同志比什么都明白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避免内战的决心与诚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同志亲自出来谈判，更是中共力求和平的最好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是建立在它的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出发点上面的，久经战祸的中国人民，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和平建国，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个前途的实现。只有向来不把人民的死活、祸福放在脑子里的人，才天天处心积虑，连做梦都想打内战。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内战的阴谋，在有些人心中，是一直没有放弃的。

这种阴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于解放区和解放区人民军队的仇视上面，也表现在相反的一面，就是他们对于敌伪军队的优容。这是两个最明显的对照。八年来，敌人长驱直入，占领了我们的广大土地，身负保国卫民之责的人，既不能或不想保护人民，人民当然只好自己组织起来，保卫自己，保卫乡土，保卫祖国。八路军、新四军，绝大多数是当地人民的子弟。可是，何等奇怪啊，他们不但得不到当局的丝毫援助，而且就从此成了罪人？“奸”呀，“匪”呀，背了一身的罪名，而且差不多都是双份的，因为敌人所加于他们的，也无非是这些罪状。这样，八年来，他们就始终处在两面夹击中。好容易日本投降了，又不准他们接受敌人的投降。可是，另一方面，伪军却纷纷的被派了新职务了，换一个符号，

连旗子也用不着改换，就成了“爱国军人”了；敌人竟被允许可以保留“自卫”的武器，现在，许多地方敌人和伪军正在攻打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为什么他们对人民的军队这样憎恨，对敌伪却这样亲爱？这里面正包含着他们一个狠毒的内战阴谋，他们就是要利用敌伪来作为他们打内战的第一线。

说到“还政于民”。在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正是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建立了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从村主任以至边区政府的主席，都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在那里，人民是真正得到了政治的权利，不过，不是由什么人出于恩惠的“还”给他们，而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努力从敌伪手里、从一切反人民的势力手里争取得来的。可是，有些人对于还没有半点民主的大后方各地，则不肯给人民一点自由，对于人民已经获得政治权利的解放区，则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它才甘心。他们说这就是“还政于民”，天下有这样的“还政于民”吗？恰恰相反，这正是“夺政于民”。如果真正肯“还政于民”，那么，在今天就首先要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府，承认人民从敌人手里争取得来的政治自由；同时立刻给大后方的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人身等各种自由，结束一党专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给人民以普选的权利。不实行这些，什么“还政于民”，就只能是空谈或欺骗。他们又诬蔑解放区为“割据”。不错，解放区是那里的人民在抗战中从敌人手里“割出”来的抗战根据地。那么，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敌人的占领区越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也就越多，这有什么不好？就用得着他们那样难过

吗？真正意义的割据，是和封建势力相连着的，解放区首先实行了民主，肃清了或正在肃清着封建势力，在将来的和平建设中毫无疑义，它将是民主的模范区域，是推动全中国实现民主铲除封建势力的主要力量。相反的，是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地区，才真正是封建割据，因为在那里，正是封建势力和一切反人民的内外势力相结合，君临着人民，压迫着人民。

你的问题，我们大体上回答了。总之，诚如你所说，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两党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呢，还是相反的问题。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困难是一定会有的；对于许多的不同看法，也是由此而来。但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民主自由，不是靠人恩赐，也不能靠人好心肠的“还”给你，是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一句格言，“能追求者必得到”，这又是一句格言。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决心和信心来争取和平、民主与团结的实现！

编 者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原载1945年10月1日《新华日报》）

农民的希望（节录）

“毛泽东到重庆来了！”这消息首先成为镇上人士的重要话题，加以种种猜测和估计；但很快就流传散布到低矮阴暗的茅屋里，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还加上一句：“帮我们下力人来的。”就象在上月里包谷都晒焦了，太阳还是愈来愈暴烈，忽然看到无边无际的天上升起了云彩，吹来了爽身的和风，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将有甘雨下降了。

农民们都晓得有闹共产的朱毛贺龙，而“毛泽东”在有些农民却还是生疏的。于是每个赶场回来的人就都变成小村子里的活报纸。

“啥子朱毛，你默倒朱毛是一个人嘛？”接着就指手划脚结结巴巴重述在镇上听来的新闻，还加油添酱地：

“蒋委员长接毛先生来拿了言语，今年可不再抽丁了。”

中心校的教员告诉我，以忠厚老实从不开腔出名的孙老五忽然有天气急冲冲地跑到学校来，紧张地问道：“听到说毛泽东来了要分地的，是哪个的么？”原来他是个自耕农。

“毛泽东来了也好，这班收生的，发国难财的该下台罗！”开明的地主如此说。

从前种种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恶意的诬蔑造谣一扫而空了，和平民主团结是万人的要求，最顽固的恶霸也不敢公然反对。

贫农都对土地租佃问题特别感到兴趣，留心打听，有的在问解放区有多远，“我们搬过去算了。”有的听说过二五减租，还问：“今年缴起了，怕明年才会实行吧？”有家佃户今年加过两回租，包谷因为天干歉收，地主还不息的来催租，就干脆回答：“今年就收到斗搭点包谷，个老子全吃光了，你哪个办嘛？二天可得减租。伸租不得行了格。”

也有细心的盘算了一通之后，“三三一还是不划算，我们拿六斗多，学米要去掉一斗，派款……”这就有人解释，在民主政治下，派款要合理公平，不得随便乱派。

“可是高头的命令乡长保长卡倒起，你哪个办嘛？”

“你默倒过去那样的选举还得行吗？”另一个农民岔进来说：“毛泽东来了，实行民主，乡长保长全要让我们重新选过。”

“那我们干人到底多些……”

（摘自李俞《农民的希望》，
转自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

新时期的路标

——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

《解放日报》社论

关于目前时局，中共中央于日前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是当前时机中的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献。

目前的时局正处在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中。八年来我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坚持不懈的神圣抗战，现在已经胜利结束了。日本的投降条约即将签字，日本侵略者即将完全解除武装，我们的全部国土即将完全光复。我们伟大的保卫祖国的战争胜利了，这是我国百年来在反抗侵略战争中第一次的胜利，这胜利是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胜利！同时，日本法西斯的败亡，远东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进行了六年之久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完成，这是全世界民主和爱好和平势力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与人民团结抗战的胜利！在战争伟大的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曾尽了重大的贡献。它的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它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乃是中国抗日战争所以能坚持以至胜利结束的决定因素。它领导下的军队——八路军

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从来不采取别人所采取的“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消极抗战的政策，它们永远是坚决勇敢大胆积极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所以当抗战结束前夜，它们包围抗击着百分之六十九的敌军，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解放了一万万人的国土，收复了二百个以上的县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的英勇奋斗，乃是我保卫祖国战争胜利底决定因素，他们的英明智勇，他们的流血牺牲，将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世所铭感不忘。

现在坚持八年的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抗日阶段已经过去。历史将在我们面前展开新的一页，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快要到来了，在全世界是这样，在中国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划时期性质的根本变化。

目前我们正处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中。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时机。一般地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是一个困难复杂的过渡，而在中国今天存在的状况下，更其困难复杂，它还包括着巨大的危险，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

在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和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可是，中国的敌人，中国人民的敌人却决不愿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独立自由与富强的中国。首先是被我们打败了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它虽然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宣言，但至今，还没有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反而竭力拖延时间以掩藏军需物资，毁灭战争罪迹，布置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们尤其着力于挑拨同

盟国的团结，特别挑拨中国的团结，甚至荒谬无耻到说它的拒绝向包围着它的当面的军队缴械投降，是为了“维护中国统一”。而日本所豢养的汉奸伪军头子更奉其主子的命令，竭力进行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的阴谋。中国的著名吉斯林份子，今天均获得了头等重要的军政职务的委任状，张牙舞爪，横行无忌。这不但使民族精神，国家礼统，荡然无存，而且极度地增长了内战威胁，因为破坏中国的和平与团结，正是这批民族叛逆的特殊使命。此外，在中国还存在其他的反动分子，他们也为挑拨内战破坏和平工作着。所以，在目前从抗战到和平建设的过渡时期中，内战的威胁空前严重的存在着。不制止内战危险，则我们无法进入和平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宣言提出了最具体的克服内战危险的办法，这便是宣言中所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的若干紧急措施，即：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

治犯。

(六)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这是当前过渡时机的最迫切的行动纲领，只有实现这个纲领才能“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我们相信：这个纲领将不仅为中国解放区一万万人民所坚决拥护，不仅为全国人民所热烈支持，而且亦必为需要世界和平和远东安全的友邦人士所赞同。我们相信：内战威胁虽空前严重，敌伪阴谋虽十分毒辣，但是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正义人士的力量，如果动员起来的话，内战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的。

可是，中共中央的宣言，其意义不止是提出了当前时机的行动纲领，不，它的意义远超出于此，他提出了行将到来的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和平、民主、团结，正如抗战、团结、进步曾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基本口号一样，和平、民主、团结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基本口号。正如在抗战、团结、进步的口号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战争一样，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下，中国人民将赢得和平。

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让我们在中共中央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周围，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吧！中国人民将赢得这样的新中国。

(原载1945年8月28日《解放日报》)

蒋介石先生胥电书后

《新华日报》社论

八月十四、二十，蒋介石先生打了两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昨天，重庆有好几家报纸为这个问题写了文章。关心国内团结，不愿再有内战，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意。为了消灭日寇接受投降之后所造成的这种严重的内战危机，我们一直呼吁着和平与民主，可是就从十七日至昨日，五天之内就被所谓“战时”新闻检查局连扣了三篇说明我们意见的社论，在这种一手遮尽天下耳目的现状之下，要大后方人民明白事实真相而发表公平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对于自承“顽固”“偏袒”之徒，我们不想多费唇舌，而对于在言论界有地位而真心诚意不希望有内战的同业和要求胜利、渴望和平民主的全国人民，我们还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一下真相，抒述一点意见。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能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来接受战果，我们深有同感。中国需要团结，这是每个人的心底冀求，但是说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团结先要民主。象目前这样一只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浮着

好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团结得拢来的。从去年七月以来，我们就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办法一直不为当局所理会。今年六月，六位公正的参政员飞延，商定了一套解决时局的办法，说起来，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极起码的要求。世界上还有那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那一个国家还不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团结统一的问题，提议由政府召集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士共同组成的政治会议来解决，这又是何等的起码要求，何等的光明正大的提议？可是，从六月到八月，政府一直置之不理。拖到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鼓舞欢欣，以为内战可以消弭，团结可以形成，那知军事委员会竟在十一日这一天下了两道完全矛盾的命令。给中央直系部队的命令是“积极推进，勿稍懈怠”，给中共所部军队和人民武力的却是“驻防待命”。现在大家都一窝蜂的说：“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了，但不知何条何款规定了在日本军伪军还没有放下武器之前就要我们的军队“驻防待命”？更不知道何条何款规定了一个国家的军队某部可以“积极推进”，某部必须“驻防待命”？侈谈军令统一的人，这一点难道就可以不统一了么？“在受降之际，无论如何，应维持一致的步骤”，我们以为乱了一致步骤的就是这一道错得很厉害的命令。全中国人民今天忧虑着的内战危机，因为这道不公道而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命令而日益严重化了；一方面要

我们不打日本人，不打伪军，一方面下命令给冈村要他不得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投降，加上大批的准许那些“曲线救国论”的伪军“反正”，委任出七道八道伪正不分的总司令的命令，这样不是表面上“蔼然诚怛”地讲团结，而骨子里命令日寇和伪军来打中国人民的军队么？中国共产党是从血海里成长，在围剿中壮大起来的，惨痛的教训太多，我们就不大容易天真地再上那种口是心非的当了。我们的态度是很明白的，我们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只是，我们要的和平不是奴隶的和平，人民被作践得没有声音的和平；我们要团结，只是，我们要的团结是民主的团结，而不是口头上的团结，用统一之名来统掉其他一切异己者的“团结”。真的，现在国脉存亡，系于当局者的一念。在大后方，一部分人是可以由新闻统制的方法而使他们一时看不出真相的，可是中国沦陷区和解放区的二万万六千万人民，因为亲眼目击谁是谁非，谁好谁歹，谁为人民着想，谁为私党争权，而眼睛雪亮的。我们从不拒绝团结的手，我们从不关闭谈判之门；可是捏着刀的手是不好握的，堵住一块独裁的大石头的门是进不去的。放下唆使日寇伪军来进行内战的这把刀，搬开堵住团结之门的那块石，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我们有权利根据波茨坦宣言解决敌寇和接受投降，严格惩办汉奸，取消束缚人民自由的法令，释放爱国政治犯，召开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才能真正的谈到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真的救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我们坚决反对内

战，我们已经声嘶力竭，舌敝唇焦，现在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的这种不渝的信念，不变的主张，同时附带上一句我们的忠告：内战的火不是好玩的！人民的力量永远不能被征服，而在这个民主大潮流中，玩这把火倒是可能将自己烧毁掉的。

（1945年8月22日《新华日报》被扣社论）

编者注：此篇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当天《新华日报》被迫开天窗。次日《新华日报》又单页印行，随报附送。

迎毛泽东同志来渝

《新华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蒋主席之请，已于昨日飞抵重庆。在全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神圣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中国和世界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国内政治上军事上还存在着许多急迫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无疑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抗战与惨重牺牲，中国人民一致地渴望着和平，毛泽东同志的来渝正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之上，合理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协力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心与诚意。国内国外的法西斯残余一直企图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来渝而击破了。毛泽东同志的来渝，象征着中国民主潮流的空前高涨，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希望。全中国真诚地期望着和平团结，忧虑着分裂内战的人民，和全世界关切中国现状与前途的人士，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由衷地感到兴奋和快慰的。

今天，全中国与全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所说，摆在我们全民族前面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之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的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在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抗日党派、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了抗战、团结、民主，全心全意地竭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我们仍将在和平团结民主的目标之下，在建国与保障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尽其伟大的任务。古人说“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在今天，全世界全中国的人民都渴望着和平，而真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时代已经进入了人民的世纪，全世界响激着民主的声音，可是无可讳言，在我们为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之上，还存在着各种的困难和阻碍，法西斯侵略者和一切反动分子在战争中失败了，可是他们的游魂还没有死灭，还在各种的化装掩蔽之下，行使一切阴谋，进行一切危险活动。对于这种重大地威胁着中国和平团结民主的阴谋活动，全国人民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它及时扑灭，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里所提的六项办法，代表着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心底要求，我们希望在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这个历史性的会谈中，能够依据这些要求，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的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是实现

和平团结民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愿意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为了长期的团结一致与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今天正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机，一切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吧。

（原载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

毛泽东先生来了!

重庆《大公报》社评

昨日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在抗战胜利到来之日，我们就曾说过这样感激的话。近来国家的喜事接二连三的来，真是令人喜不自禁。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是一喜；中苏订约，结为盟好，是一喜；毛泽东先生翩然到渝，又是一喜。毛先生为何而来？是应蒋主席三次电邀而来。蒋主席致毛先生电，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又说：“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现在毛先生来了，他下飞机时发表的书面谈话，说他的来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请想：现在抗战已告胜利，盟友业已结成，我们再能

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一切好事，有的已经到来，有的已在开始，循此发展，国运开拓，前途无量。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

毛泽东先生来了！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数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见，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谈商，我们可先不作内容的推测。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我们高兴，我们庆慰，我们谨以胜利中国言论界一分子之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

（一）抗战胜利了，强敌投降，河山收复。在历史上，我们不少外寇入侵河山破碎的事。多少志士仁人，民族英雄，立志重整旧河山，有的赍志以殁，有的勉强成功，都是很可感叹的。今天抗战胜利了，全军全民得见强敌投降，河山重光，真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但是，我们也要确定一个新观念，就是，今天抗战胜利所交给我们的任务，不仅仅在于“重整旧山河”，更积极的，还要我们“建设新国家”。不拘于消极的整旧，而锐意于积极的建新，则今后的国是虽然千端万绪，却不难提纲挈领，而得其大道。

（二）抗战胜利了，我们接受这胜利，应该不仅仅限于狭义的报仇雪耻，还要更广义的认识抗战胜利是一大革命。这次大战，对全世界都已起了革命的变化，尤其在我们几个主要的盟邦更起了显著的革命变化。在美国，为尽其世界民主国家大兵工厂的任务，供应广大的世界战场的需要，在工业上起了大革命。又由于原子弹的发明，在世界科学界起了

大革命。美国大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的，英国是大大的进步了。中国呢？八年苦战，濒于毁灭而新生，当然也已经起了革命的变化。我们应该有慧眼看得出，我们更应该有决心有勇气向革命的方向走。胜利后，大家喊复员，人人想回家，是理智，也是人情。但是，我们却不厌重复的提醒大家：复员不是复原，回家不是享福；我们应该自为时代的主人，向前进步！世界在革命前进，中国也必然如此。国内一切事，象似头绪纷繁，难于就理；但是，只要有慧眼看出时代主流，有决心有勇气向革命前进，则一切感情恩怨，历史微痕，真是渺乎其小的不足道了。

（三）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一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原载1945年8月29日重庆《大公报》）

毛泽东到了重庆

《华西晚报》社评

毛泽东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

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因为日本投降，不免使人感觉如果抗战胜利了而没有国共两党的团结，中国人民将仍旧不能享受胜利的果实，不能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

中国人民迫切地期待中国两大政党团结，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是造成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内情势。而领导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密团结和广泛合作则是造成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际情势。很明白的，在此情势下，如果对中国命运应负重大责任的国民党确具结束一党专政与在野党派团结合作的诚意，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但是，存在于目前的现实情势是不可忽视的。如举世所共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的基本的人权自由仍旧掌握在为国民党所建立的特设官署里；中国的政党政派仍旧没有

合法地位；被禁闭了多年的政治犯仍旧充塞在各地的集中营里；更严重的是，由于受降问题所引起的国共两党武装冲突，仍旧在继续之中。那么，国人必须认识，毛泽东是在一个实际政治还没有任何新气象的时候来到重庆的，本来一般预料应以改进实际政治为起点的事件，现在转过来，成为谈判的节目了。

这是一个起点。并且是一个决定的起点。从整个国内国际大势，中国人民有理由相信，由这个起点开步，将能走到他们所祈求的未来。但是中国人民不应该等待，应该赶快站起来，向国民党说话，向共产党说话，向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说话，我们要求他们团结，我们要求民主政治，我们要求联合政府。我们应该以人民的压力加给他们，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我们应该以人民的力量使得这个新的国共两党领袖的谈判，如人民所愿望的获得成功。

（原载1945年8月29日成都《华西晚报》）

中国能否取得和平

《新华日报》社论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一个旧的时期即将结束，一个新的时期即可开始。在这个转变关头，大家横梗在心里的就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时局转变的关键，复员必需和平团结，建设必需和平团结，打了八年的仗，大家流血流汗忍受了无限的痛苦牺牲，尤其需要和平团结。只有和平团结才能够使中国在八年血战后得到苏息，只有和平团结，才能够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展开新的建设。

因此大家要问：国内的和平团结是不是可能的？

可能是决定于需要与实现需要的条件。今日环绕于国内国外的一切形势，是需要和平的。就国外形势来看：世界各国人民是需要和平的。这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由于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现在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全部崩溃了，全世界的联合国与全世界的人民在这个惨酷的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牺牲，决不容许再有任何战争发生，这是当然的逻辑。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世界的和平，必需保持中国的和

平。环绕于中国的世界各国没有一国是不需要和平的，也就决不会允许中国的不和平。

再看中国：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人民的愿望，而中国人民是需要和平并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和平的，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苦战，特别在八年抗战中间，在敌人的摧残下已是疮痍满目，所以人心厌战，已经是现在普遍于各阶层人民的情绪，这是谁也不能忽视的。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人民的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一向要求国内的和平团结的，一九三一年日寇对我国开始大规模侵略行动，第一个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国难愈加深重，第一个以实际行动来消弭了内战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八年当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敌后解放区一万万人民，以伟大的斗争坚持了抗战，也坚持了团结，到了现在，由于解放区的飞速发展与空前壮大，更成为保证中国和平团结的支柱。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来到重庆正是这一点的最好说明。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和大多数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早需要和平团结的。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是和平团结，这就是中国国内足以实现和平团结的根本条件。

因此，无论国际国内的条件，都表示中国有和平的需要，并且有实现和平的可能。当然，实现和平的暗礁还是严重存在着的，全国人民必需警戒与团结起来为克服暗礁而奋斗。为了克服和平的障碍，为了消灭内战的危险，最中心的关键

就是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和平团结才是可能的。因此现在和平团结的关键，是立即实现民主，立即实行中国共产党本月二十五日《对目前时局宣言》所提出来而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六项紧急措施。实行了这些紧急措施，就可以确定地消灭内战分裂的危险，就可以开始国内的和平建设。

(原载1945年8月30日《新华日报》)

民主的政治与民主的军事不可分割

《新华日报》社论

今天的人民是希望内战分裂呢？还是希望团结统一呢？当然，是希望团结统一。人民希望政治也统一，军事也统一。但是统一的政治，统一的军事，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军事呢？当然，人民决不希望统一的政治，是贪污普及于全国的政治，统一的军事，是军阀横行于全国的军事。如果是这样，那统一对于人民有什么好处？对于国家有什么必要？这样的统一，至多也只是极少数人所希望的统一，不是极大多数人所希望的统一，而既然如此，这种统一也就必然失败，也就必然成为极少数人的梦想，也就必然得不到极大多数人的同情。

反民主的统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到了今天，已经是陈腐透了。今天极大多数人所希望的统一，是新式的民主的统一，这就是说，全国应该统一实现民主的政治——建立人民的政权，统一实现民主的军事——建立人民的军队。为了这个目标，中国人民已经奋斗了很久很久，就从孙中山先生开始革命活动以来，也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是中国的地方太

大了，中国的困难也和中国的地方一样大，因此直到今天，要彻底实现这种新式的民主的统一，要普遍建立人民的政权和军队，谁都知道还是很不容易的事。中国人民今天所庆幸的，就是五十多年的奋斗究竟不是没有结果；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民主的改革已经有了可以相信的成就，这些成就可以相信，是因为第一、这些实行了民主的地方在八年的战争中经过了残酷的考验，证明这些地方的人民确是在民主制度下动员起来了，因而表现了坚强的战斗力，与不民主的地方大不相同；第二、不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地方情形也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足见那里的民主已经说得上是源远流长，而不是仅仅为了战争的一时的需要了；第三、这些成绩已经被中国的外国的一切公平的观察者所证明，并且事实上关于那些地方的报道，一大半正是从这些无党派的观察者得来的，只有一小半是那些地方自己的宣传，而这种宣传也并不曾比旁观者的报道说得更好些。这些地方，就是拥有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因为有了解放区的这些可以相信的初步的成就，全中国的民主统一就有了确实的基础，全中国人民对于民主统一的彻底实现也就有了巩固的信心。如果全国的民主是三层楼，那么解放区就是已经筑成了第一层，只要这一层站得住，其他两层当然可以逐步的完成了。

有的人说：为了筑三层楼，应该先把第一层拆掉。这种说法的目的，还不过是实行反民主的统一，它的错误我们已多次辩正过。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虽然承认解放区的民主

设施，但是认为解放区的政治民主与军事民主不能并存，必须割去一面才叫“民主”。这种说法的错误也是显然的，因为民主的军事实际上只是民主的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是不能互相分割的。鱼不能离开水，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的政权，其惟一的结果便是消灭。解放区的军队所以是人民的军队，因为第一，它是人民在自己的政权下面以主人公的身分自愿组织起来发展起来的；第二，它是在人民政权的民主精神下面受训练的；第三，因此它对于人民能够建立一种自我牺牲的友爱关系；第四，因此它能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与人民协同一致，并表现自我牺牲的顽强与英勇；第五，因此它又能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和平时期自己从事生产，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并帮助人民的生产建设。试问：这样的军队，在没有彻底实现民主的地方，在旧式的脱离人民的军队与其他势力的包围中，能够被允许继续生存吗？试问：这样的军队，继续生存下去对国家有什么不好？消灭了这样的军队，让全国的人民都处在旧式的军队的控制之下，让全国的军队的革新失掉一个基础与模范，对国家有什么好？消灭了人民的军队，其下文当然就是消灭人民的政权。因此，这种说法虽然转了一个弯，其实还是为筑三层楼，先拆第一层的说法的化装吧了。这种说法，既然还是为了实行反民主的统一，违反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因此也就必然失败，也就必然成为极少数人的梦想，也就必然得不到极大多数人的同情。

（原载1945年10月2日《新华日报》）

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

——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

《新华日报》社论

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全世界各盟邦及其人民所热烈关心的国共商谈，现已完成初步阶段，毛泽东同志于昨日飞返延安，双方代表并已共同签字发表《会谈纪要》。商谈经过情形如何，其后果又如何，那些问题业已解决，那些问题犹待续商，这一切现已公开于世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毛泽东同志应蒋主席之邀而远道来渝并非徒然，双方代表在此重大时机会谈月余并不是没有结果，各方的热烈希望也并没有落空。这次会商的内容确不只是国共两党间的利害关系的问题，而是有关全国范围的民主进步，有关全国人民的自由幸福的。这次会商的结果对于保障和平，推动民主，加强团结，促进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

第一、在这双方共同发表的《会谈纪要》中，首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这是符合世界潮流，也是符合全国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的愿望的。抗战胜利结束后，不应再

有内战，中国必须进入一个和平建国的新时期，这固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但我们试回想一下，在八年前，从内战时期转入团结抗战时期，那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毕竟能实现了。今天的大势所趋，比八年前对于和平的条件，更加有利，纵使今日的困难比当年更大，但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平建国也一定能够实现的。在和平建国时期中共坦率表示愿意继续承认蒋主席的领导，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并继续采取长期合作的方针，政府方面已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并承认党派平等合法，这正是建立和平的有力保障。也就是根据这个基本方针，中共代表对于各项具体问题提出若干主张，做了若干明显的让步。已经得到协议的各点固然都足以保障和平，其未得协议的，也已奠定了今后寻觅合理解决途径的基础。我们相信，根据和平建国的总方针，一切问题，是能够逐步获得解决的。

第二、这次商谈的结果，对于推动民主，是有显著的贡献的。中共的主张虽然从立即结束党治让步到为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先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会议的召开，自能有助于民主的推动。现在国民大会势已不能如原定日期召开，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得到合于民主原则的解决。《会谈纪要》中的第四至第八项都是已得共同协议的民主实施问题。最近时期来，政府当局已在大后方地区取消言论出版检查制度，并解散了某些集中营，这些有益于民主的事都是值得欢迎的。现在商谈结果既已公布，我们希望当局立即采取切实的步骤，保障人民的全部自由，废

止或修正一切限制自由的法令，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取消中统军统的特务权力和特务活动，立即释放政治犯，并在各地方开始实行自由的普选。那就更能使民主的实施得到良好的开端。至于在抗战胜利中的解放区内，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且已经建立了民选的地方政府。在实施民主的总方针下，解放区人民所已经得到的权利自不应缩减，而应加以合法保障，民选地方政府的制度自不应取消，而应该更加推进，更加在广大的民主基础上进行。

第三、国内的团结因这次会商而加强是很显著的。这次会商的经过及其结果都足以表现双方共谋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不远千里而来，显然是出于至诚和大信，来渝后由蒋主席热诚款待，与蒋主席多次会谈，亦都融洽无间，而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中间虽然有过停顿，但从没有丧失他们加强团结的信心，并始终保持友好和睦的精神。昨日毛泽东同志返延，更蒙张治中先生陪送，盛情尤为可感。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今后也一定会保持同样的团结精神继续商谈的。《会谈纪要》中最后二点，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有关团结的问题。我们认为，汉奸要受法律制裁，伪军解散需要妥善处理，这些本无问题，希望政府速即明白颁布符合人民愿望的惩治奸伪的法令和办法，并即认真执行，以息人民的疑虑，而使得一切奸伪都不能改头换面，继续为非作歹，甚至拿着武器，进攻解放区，以致影响到国内的团结。重划受降地区的问题，也是同样。让一部分日寇军队仍能有所借口，武装行动，以遂其破坏中

国团结的阴谋，这种不幸现象是必须赶快结束的了。关于解放区军队与解放区地方政府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可看到，中共方面实已做了极大的让步，继续进行协商，以更加加强团结而实现和平民主，这正是今后要做的事。

第四、说到统一，谁都知道，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才能长期建设，这是真理，而有了和平民主团结，也就一定能有统一。中国所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一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有了民主，还要有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统一。这次会商的全部过程都表现着共同协商，集中领导的精神，也就是民主统一的精神。在《会谈纪要》中，不论政治协商会议，不论民主自由，不论整编军队，不论地方自治，都可看出是在力谋政令军令之统一的。现在，中共及其他方面都承认国民政府与蒋主席的领导，中共更在协商中，赞助政府，力谋政令军令之统一。那么，只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共同协商的精神，中国走向完全的统一是不成问题的。

以上说的，是这次商谈中的积极成果。今后要保持和发扬这些成果，使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更能巩固发展和加强，是否已没有困难了呢？不，应该承认，困难是有的，而且还可能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了这次国共商谈的成就做基础，加上双方继续的努力，和全国各党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在月余来的商谈期中，有人因为不明真象或误信谣言而致悲观失望，以为商谈决不能有好结果，现在实际情形已经完全揭幕，疑虑和失

望是应该代之以努力和信心的了。但也许还有人因为商谈至今仍有不少重要问题未得协议而失望的，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失望也是不对的。要知道，中国的问题从来就是错综复杂的，要求人们以坚忍耐烦的精神，不懈不怠的努力来解决他。一步不能登天，四十多天的时间，虽然不短，但也决不能把一切困难一扫而净。我们应该尊重政府与中共双方代表经过这多少天的努力所已得的成就和已奠定的基础，用人民的力量继续努力，准备克服任何困难，那么，我们深信前途固然还会经过多少困难和迂回，但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必能打破一切困难，通过一切迂回而大放光明，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是终究要实现的。

因此，我们认为，月余来蒋主席与毛泽东同志的会晤，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会谈，是一件历史上的大事。

《会谈纪要》正在双十节于重庆签字发表，这的确是值得全国人民来双重庆祝的。

（原载1945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

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

《解放日报》社论

八月底起，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这说明了为什么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如此焦急地期待着会谈的结果。昨天发表的《政府和中共会谈纪要》，给了公众以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会谈纪要》证明了商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为中国和平、民主、进步、发展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会谈底第一重要成果是，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这点，《纪要》说：“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这明确肯定地答复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最关心的问题：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将向那里去？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再三申述：“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宣言）“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现在中国共产党此项方针，经过协商已经取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已经成了举国一致的基本方针了。这一和平建国的方针的确立，就保证了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胜利的巩固，和奠定了中华民族今后向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飞跃发展的基础。这是会谈的最主要收获。

可是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的协议，给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

在政治民主化与党派平等合法方面，在《纪要》四、五、六、七、八项中，分别指明了：“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

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凡此各项，都是使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最初步条件，保证战后中国人民享受和平、民主生活的最初步条件，会谈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结果，已经给中国人民争取实现新的民主主义国家以强烈的信心。

在军队国家化方面，会谈也得到若干成果。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地组织起来的以保卫祖国为任务的武装，八年来它始终处在国防的最前线上，在最艰苦的阵地上为祖国的国防服务，他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和私图，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为国防服务。这个军队，在各方面，为军队的国家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是中国统一的民主政府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它应该成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的国防军之一部分。由于中共在这一方面的重大让步（巨大的缩减解放区军队的数目，从八个解放区撤退等等），使这个问题虽未全部解决，但已给进一步的协商，建立了基础。

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的确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的获得初步协议，这是会谈的重大成就。鉴于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的极端复杂性，会谈所获的协议，是具有更伟大的价值与意义的。人民的团结意志，会谈双方的互让互谅，这是这次会谈成功的基础。

可是会谈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的，也不是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首先是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如何召开国民大

会的问题，没有获得协议。而这两个问题是有关实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对已经实行了无拘束的自下而上的普选的地方自治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和如何的使将来的国民大会能够真正确实的代表和执行人民的意志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彻底应用会谈已经确定了的共同原则之一，即政治民主化，这些问题是可能获得解决的。

会谈严重的打击日本法西斯残余及其他反动分子阻挠和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可是他们必然会继续其种种阴谋破坏活动，因而在解放区问题、受降问题、严惩汉奸及解散伪军等项问题上，今后的谈判及执行中，还会有许多严重困难的。再则，此次会谈已获解决的问题，不论基本的和平方针也好，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诸项问题也好，要把写在纸上的东西变为实际的东西，还得用很大的努力。在执行这些决议中，如果没有各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认真实践，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不但存在，而且很大），那么纸上的东西可能变为空谈，变为一钱不值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举国一致的和平方针之下，经过各党派及人民的一致努力，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总之，此次会谈，获得到了重要的成果，表示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中国人民及抗日党派面前还有很多的困难，走向光明的道路上还有荆棘，还有曲折，还有障碍，但是我们坚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为此而坚持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休止，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原载1945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

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

重庆《大公报》社评

毛泽东先生自八月二十八日来重庆，于昨天飞返延安，在这四十几天中，政府与中共方面曾有多次的会谈。因为团结问题所包括范围甚广，关系国家的命运至大，所以这一会谈为全国人民所焦切关心。这一会谈，以毛先生之来与去为一标志，已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就，发表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目了，所以此刻读到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兹特检析会谈纪要的内容并附述所感如次：

会谈纪要共载十二项目，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双方完全同意的，是属于人民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方面的。如：（四）关于人民自由，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政府方面表

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这五项是双方毫无争论而一致同意的，这都属于人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我们以为这不必作为任何交换性质的条件，不需等待时间，政府即可立予实行，以示抗战胜利与民更始之诚。

第二类双方部分同意而待继续扩大商谈的，是属于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如：（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洽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三）关于国民大会，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草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解决，五五宪草可加修改。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这两点，是政治问题的重心，其所得的协议，可说是这次会谈中的最大收获。一党训政应该结束，国民大会应该召开，以便国民党还政于民，而使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是全国

一致的公意。国民大会所关联的几个问题，其代表，其组织，其所制宪法的内容，此时肇端，系国家千百年基础，所关皆甚大。在这方面，政府与中共之间尚有歧见，留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与中共同意召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是使政治前进的一条路。现在双方同意召开这一会议，是一个重大的收获，惟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尚在与各方洽商中。

第三类是现实的军政问题，如：（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等问题，均须详商办法。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最为实际困难。中共方面初提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认为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提出的方案，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以原有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中共再提第二方案，

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中共复修改此提议，请委省主席者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副主席者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为平津青三市，此方案未商成，中共复提第三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之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后，呈请中央加委。政府表示县级可以加委，惟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中共复提出第四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目前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这问题未得到结论，又不容久悬不决，以障碍和平建设，双方同意继续商谈。（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这是目前最尖锐最现实的问题。目前若干收复区的军事混乱，即由竞争受降的不统一现象而起。这一如同燃眉之急的问题竟未商得解决办法，不免令人失望。

综合以上三类问题，第一类无问题，应该至诚至速的付诸实施。第二类是政治上的大问题，皆关建国根本，前提同，认识同，虽有歧见，希望能由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机构商得一套共同的办法。第三类是最现实最棘手的问题，复杂难决，但必须求得一个安顿，求得一个解决，才能真正避免内

战的危险。自然，会谈纪要所发表的尚只是初步成就。但因为太关切了，所以最瞩目。抗战既已胜利结束，我们国家的统一团结岂容落后？建国大计需要立即商定，建国工作需要赶快开步，一切反统一反团结反民主反建设的现象及倾向都应该一律廓清了。我们对团结会谈所涉及的这一串问题，有一个看法，以为应该由安定实现建设民主着手。现实问题本是最棘手的，也是危险的。惟其棘手，所以难解决；惟其危险，所以需解决。这种问题，由会谈内容看来，实在不易解决，目前似可从求安定着手，但求不决裂，力求妥协，尽力增加向心力，力避割据争夺现象，以求得一个过渡的办法，到国民大会开成，民主的宪政政府出现，就一切可以纳入正轨了。因此，我们希望拟议中的三人小组赶快实现，在军事方面商得一个大家都过得去而又不伤国家体面的办法。因此，我们希望政府与中共代表仍继续商谈，把所谓解放区的政治问题商得一个妥协的办法。能如此，中国真正避免了内战的危险，则请一切均由民主开始。团结问题看似复杂多端，但问题中的重心是相同的。这个相同点，就注定国家能统一，政治能团结。这相同点就是民主。共产党及全国人民都要求民主，国民党也要民主，并且一再坚决表示要结束训政，要还政于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请一切由民主开始！因此，我们希望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实现，各党派及各方贤达，请就国民大会问题及宪法问题一丝不苟的研讨定计，为国家建成民主的基础。只要慎之于始，勇之于始，使民主宪政的一切工作毫无可议之处，将来国家

统一政治民主了，则目前所难解决的若干军政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只求现实得以安定，即请努力向民主开步，这是毫无危险的坦途。

最后，我们应该说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已很不少。解决现实，奔赴理想，还待大家继续努力。会谈纪要的第一项说：“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种精神，这种理想，都是值得赞扬的。会谈纪要又说：“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我们更对这两句话寄无限的期望。毛泽东先生虽已离开重庆，这四十几天的旅行，必然使他痛感全国人民的热望，并证实政府及蒋主席的诚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原载1945年10月12日《大公报》）

政府与中共的会谈

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抗战虽已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但和平是否将在中国遭遇危机，原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和若干关切中国问题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了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统一团结，显然还有一点罅隙，这个罅隙能弥补，中国才有和平建设可言；不能弥补，便有引起内战的危机。

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是悲剧的演出。这以来，不止望和平建设如凶年望岁的四万五千万同胞，将陷于绝望的深渊，中国本身的安定，固将无法确保；同时全世界也将蒙其恶劣的影响。我们过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余的抗战牺牲，也就换不到任何的代价了。

蒋主席为了阻止这悲剧的发生，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再三坚邀中共领袖毛泽东氏来渝，商谈促进统一团结的步骤，决本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觅取中共问题合理合法的解决。毛泽东氏抵渝之后，亦复坦白提出问题，作为商谈的对象。于是政府以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诸氏为代表；中共以周恩来、王若飞两氏为代表，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

的途径。结果遂在四十三日的会谈中，决定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基本方针，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并决定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有关国民大会的问题，由军令军政两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代表一人成立委员会，对中共军队改编的原则，讨论实施的具体办法；其他未决事项，则决定继续商谈，徐图解决。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致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会谈结果之所以能够成为内战可以避免的保障，当然是以政府和中共都能发挥相忍以为国的精神为主因。政府为了觅取中共的合作，决定以有关国民大会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并不坚持原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日期；决定对中共所提缩编中共领导下抗日军队为二十个师一事，予以考虑；又决定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之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这种重大广泛的忍让，尤其是这一次会谈能够顺利进行的主因。政府为什么要作这样重大广泛的忍让呢？理由很简单：经过五十年来革命和八年余抗战的中国，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政府自当不惜采取任何忍让的步骤，求其能拯斯民于水火，奠和平建设之基。

全国人民本于过去国内长期不统一，政治因而不能上正

轨，经济建设因而不能获得重大发展的痛苦经验，现在一致的热望当然是如下述：第一、政府与中共能就未决的若干问题，继续会谈，促成迅速的解决，替国内和平奠下比目前更坚固的基础，第二、解决问题固贵迅速，尤贵彻底，以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消灭团结的障碍，第三、对于若干情形复杂的收复区，立刻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统一其军令政令，务使久为敌伪所蹂躏的人民，不再因军令政令的不统一而遭遇手足无措的痛苦。

这种国民一致的热望，政府固极重视，中共亦表深切的同情。因此，我们深信：中共亦将以重大广泛的忍让，作为对于政府重大广泛的忍让之答复，而继续会谈的前途，也将因此而愈显得光明坦荡。

韩非子说：“木之朽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我们将易其辞为：国家之败也必因不统一，民族之弱也必因不团结。我们现在必须迅速弥缝统一团结的罅隙，向着和平建设而迈进，来实现一个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新中国。今日全国人民所要求者，没有比这还迫切的事。

在这一迫切要求之前，每一个政治的集团都不能不谋所以适应之道，我们相信中共必能了解这一点，同时也希望中共把握这一点。

（原载1945年10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

阳光普照雾山城

——忆毛主席在重庆

王炳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

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领导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

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

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我原揣想，象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会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就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陕西省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象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道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

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揭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

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象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手忙脚乱，窘迫无以措词。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

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象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重庆谈判时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组织。）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

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与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

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我同他们的关系，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从容自若，经常出现在群众中间。记得九月一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参加中苏文协宴会，刚一跨进会场，到会者一齐向毛主席围过来。很多老朋友拉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市民听到毛主席出席了欢迎会，虽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却抑制不住多年久仰的心情，无数工人、学生拥到街头，等着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门，向群众频频招手，街道两旁顿时欢声雷动，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

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通知主人。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重庆度过了四十三个日日夜夜。从谈判桌上到谈判桌外，毛主席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时机。面对风紧云沉的时局，毛

主席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领导我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反动舆论也叫嚷“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在谈判中被动失利，转而策划军事冒险，指使阎锡山一再大规模进攻上党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击，消灭了全部来犯的敌军十三个师。蒋介石玩弄政治骗局破产，发动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得于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它的发表，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非常的被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

十月八日晚，张治中先生举行宴会，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李少石同志在红岩村附近不幸遇难事件。当时事件真相未明，许多人为毛主席安全担心，劝主席暂住城内“桂园”，不回红岩村，以防万一。但主席泰然镇定，坚持仍回红岩村住地。周副主席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毛主席，并要国民党当局坚决保证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十月十一日，毛主席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带着辉煌的胜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从

此，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展开了一个新的更加壮丽的革命进程。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九期，

本文选用时有删节）

重 庆 谈 判

颜 太 龙

一九四三年，我跟着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正是延安整风时期。过了一段时间，总理告诉我说：“太龙，我在延安还要呆一段时间，你过去没有学习的机会，现在趁这个机会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吧”。中央党校到总理住的枣园大约有十多里，到杨家岭很近，当时我在总理身边已经工作七、八年了，感情很深，不愿意离开。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情，说：“你去吧，学点马列主义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总理，到党校去了。一放假，我老早就跑回总理住的地方，他住枣园，我就去枣园，他住在杨家岭，我就去杨家岭。每次回去，他都问我学习得怎样。我向他报告了我的学习情况，总理很高兴，有时还让我讲一讲心得体会。我讲完了，他总是再进一步向深入引导，教我进步，我深深地感到在总理身边的温暖。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有一天总理要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要他们通知我到总理那里去。我很高兴，经过一段学习，又要回到总理身边了。我很快地赶到了总理

在枣园住的窑洞。总理说：“好，太龙，你回来了”，然后严肃地说：“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明天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你和龙飞虎对重庆比较熟悉。龙飞虎已在重庆，陈龙同志和你一起去”。我马上回答：“保证完成任务，用我的生命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总理说：“主要是保卫毛主席，要保卫主席，爱护主席。”

当我从党校回枣园时，在路上看到一架美国飞机正从空中降落下来，原来是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张治中将军和驻重庆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来延安迎接毛主席。

八月二十八日，天气很好。毛主席为了国家民族大计，不顾个人的安危就到重庆去，延安党、政、军领导同志，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人民群众几千人到机场送行。大家都不放心，怕蒋介石要阴谋诡计，担心主席的安全。毛主席高瞻远瞩，说谈判就是去同他们作斗争，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主席上飞机前，总理叫我们到飞机上去检查毛主席的座位和安全带，总理上飞机后，趁毛主席挥手向欢送的人们告别的时候，又亲自检查了一遍，总理特别向我们交代：“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总理为什么这样叮嘱我们呢？因为总理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理长期代表我们党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工作，他深知那里白色恐怖的残酷和特务活动的猖狂。

总理在重庆工作时住在曾家岩五十号，是一幢三层的小楼，我们住一楼、三楼和二楼的一部分。

凡是总理住的地方和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国民党都布置了特务，什么样的特务都有，有坐汽车的，也有靠两条腿的，有卖甘蔗的，有卖桔子的，卖香烟的、坐茶楼的。我们曾家岩五十号大门口，一个卖烟的，长期盯在那里，什么人进出，他都清楚。总理住处的对过和巷口，就是我们的邻居，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和特务机关。这里是总理进出上下车必经之路，这个地方摆着一些汽车，我们一出门，他们就跟踪我们，监视着总理的一举一动。他们还企图绑架我们的同志和爱国人士。所以有时总理出去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就告诉我今天到什么地方去，一定要想办法不让特务跟踪。把任务交待清楚了，总理就叫我开车。我知道了要去的地方，本来是向西，我就向东。发现特务的汽车来了，我就快速地七拐八拐，把特务甩掉。然后再转到要去的地方，告诉司机几点几分把车子开到什么地方。一般说来，我们晚上跟总理出去都是好几个警卫人员，我们到了，车子也就到了。我们在重庆八、九年的时间，总理出去也好，其他同志出去也好，总是采取各种办法不让特务跟着。特务也承认共产党的人，他们跟不上，汽车也跟不上。

有一次，一个特务给总理写了封恐吓信，信封里还装有一颗子弹，送到我们收发室，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收发同志当时没有注意，过后把信打开，里边有一颗子弹。信的内容，我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是用来威胁总理。总理看完后，

很蔑视地一笑。总理就是以这样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临危不惧，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着，战斗着，把自己的一切完全置之度外。

正因为总理深知重庆暗无天日、特务横行的情况，所以总是特别周详地叮嘱我们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飞抵重庆，国民党和各界人士都到机场去欢迎。还有各国驻重庆的新闻记者。我们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和干部也都赶到机场去迎接。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然后乘蒋介石的汽车进城。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林森公馆（林森是国民党政府的前主席）住了一天。一到那里，总理特别交代我们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检查到，看是否放有炸弹和燃烧品等，一点也不能马虎。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仔细检查完毕，向总理报告，总理还不放心，怕我们年轻人大意，他又亲自仔细检查，除主要地方外，连床上床下，枕头都看，在椅子上坐一坐，然后才让主席进去。主席住下后，总理告诉我们保证房间不要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主席走到那里，总理跟到那里。下午，总理告诉我们，蒋介石要来拜访毛主席，让我们到门口警卫。下午约四、五点钟的时候，我看到蒋介石来了。陪同他来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我马上去报告总理。这时总理正好在主席房间，他们一起到会客室。蒋介石到会客室后，我们警惕地站在门口，注意保卫毛主席和周总理。蒋介石的卫兵也站在外面。

这次会见大约二十分钟，蒋介石便走了。双方宣布了代

代表团名单。毛主席委托周总理和董老（应为王若飞同志——编者）为代表，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国民党方面委派了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当时谈判的代表是对等的。

毛主席和总理在林森公馆住了一天，就搬到了红岩村我们的办事处，和我们的同志们住到一起。总理亲自给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讲，要他安排主席住在总理指定的那个房间里，并且指示布置要简单、朴素、整洁。我们给主席搬来了床、书桌、书架、椅子和躺椅，总理亲自在主席的床上坐一坐，看是不是摇晃，有没有声音，怕影响主席休息。总理又在椅子上坐一坐，在躺椅上躺一躺，看是不是平稳，连被褥、枕头都一一看过，从大到小，总理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戴主席。

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和周总理特别忙，国民党军政界和各界人士都来拜访我们主席和总理。主席和总理除了接待客人外，还经常出去。每次出去，总理对我们的工作都做详细的布置，前面是那部车子，坐那几个人，后面是那部车子，坐那几个人，主席的车子坐那几个人。车子的速度，两车之间的距离，都一一地交待和安排。当时总理指定我坐在主席和总理的车子内。因为主席坐的车子是蒋介石的，司机也是蒋介石的，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周围的亲信，都是他的同乡，外乡人他不放心。我们对这些受蒋介石信任的人更不放心。总理对我交待的任务，特别要注意监视和控制司机，速度、超车和拐弯都要保证安全。当时我的枪上了子弹，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司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行驶到悬崖峭壁的

地方，我就更加特别注意。因为重庆的马路要不就在山上，要不就是沿着嘉陵江和长江边上走，担心司机把车子开到山下或江里去。

除了我们注意这个工作之外，总理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给我们讲，尽管司机是蒋介石的亲信，也要跟他搞好关系。他做这个工作是为了挣碗饭吃，他跟我们一块出去，我们和他要把关系搞熟，关心他吃饭，给他烟抽。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很快跟司机搞得很熟。总理还亲自跟司机谈话，说毛主席是我们共产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重庆这个地方车子多，路又窄，不好走，要注意安全。司机说：“请放心。”我们当然不放心。每次出去，我们总是一方面作他的工作，一方面控制他。

我们红岩村办事处在山上，上下坡是很陡的，汽车不能通行。原来石阶有三百多蹬，总理都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后来国民党在山下搞了很多小别墅和特务机关，路修了修，但还有一百多蹬。主席每天上下很不方便。后来张治中将军主动提出把他的公馆腾出来给主席做接待室。

张治中将军是我们的朋友，他把公馆腾出来给毛主席做接待室，当然是一番好意，但是总理还怕稍有疏忽，叫我们以打扫卫生的方式，全部检查一遍，特别是主席接待客人和休息的那个地方更要仔细检查。主席不住在那里，只在那里接待客人或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检查完了，报告总理。总理乘主席在红岩休息的时候，坐上汽车亲自去看了看，然后提出要蒋介石派宪兵警卫。蒋介石派了宪兵队住在那里。对宪

兵我们是不信任的，总理又告诉我们会客厅和休息室二十四小时不要离人。

每天下午三点钟，主席会客之前，总理就问我们“卫生搞干净了没有？”我们理解总理的意思，因为有客人来，总理只好这样问我们。我们就报告总理“都整理过了”，“没有离开人”。总理才放心。

主席会客后，或是稍微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总理就到宪兵队去，找宪兵队长谈话，和他们的士兵一一握手，向他们讲毛主席到这里来同蒋介石谈判，是为了挽救中国，要他们注意警卫工作，不要让外人来。有人进来，要通过我们的传达同意。总理还关心地问他们每月多少钱的伙食。他们的生活也是很苦的，菜金很少，总理就告诉钱之光同志说：我们再艰苦，也要拿点钱出来补贴他们，让他们每天有点肉吃。总理还指示我们和他们接触，向他们宣传，帮助他们，和他们搞好关系。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开展工作。总理和他们握了手，他们感慨地说：“周恩来这么大的官，还和我们握手，关心我们的生活，这在国民党内是见不到的，国民党的大官只是知道关我们，打我们，骂我们，共产党官兵平等。”等等，很受感动。后来蒋介石知道了，就不断地换防，一个星期换一次，一个也不留。我们有些不大高兴，向总理报告说，我们刚把关系搞熟了，我们要他们干什么，他们都能去作了，可这样一换，我们的工作都白做了。总理说：“这不很好吗？他三天换一次，隔一天换一次才更好呢，这样我们可以扩大工作面，扩大宣传面，扩大影响面。

他来一批，你们就做他一批的工作。”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积极对他们做工作，为的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保证我们主席的安全。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酒会，还办了一个苏联民族生活展览，当时该协会会长孙科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参观。我们和总理说，这样的公共场合，建议主席不要去了。总理说主席要去，叫我们把保卫工作布置好，保证主席的安全。当时有国民党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陪毛主席去参观，一些苏联人在馆内迎接，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都到展览馆周围去警卫。我们去的时候，把车停在门口。当时重庆人民没有发现，也不知道主席去参观。国民党的要人和民主人士也跟着来参观，一会消息传开了，人越来越多，都汇集到展览馆来了。展览馆内有好几个馆，挂的都是图片，可是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去参观展览，而是要去看毛主席。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每个人都想亲眼看到毛主席。四川的房子大都是竹子做的，人越来越多，房子都摇晃了。总理看到这种情况，马上从主席的后面插到前面带路，想把主席引走。主席知道了，说看完吧。大家都来看主席，人非常多，我们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冯玉祥和张治中也告诉总理说：“这房子危险，毛先生离开这里吧。”主席还是坚持要看完。院子里的人更多了，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往前走，人群把冯玉祥、张治中都挤掉了，也不知挤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总理非常着急，跟我们三个警卫人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要保护主席的安

全。”就这样，总理走在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说：“请大家让开路”，“请大家让开路”。主席走在中间，我们三个保卫工作的同志左一个，右一个，后边一个，保护着主席往外走。我们到了大门口原来停车的地方，主席的汽车不见了，我们很紧张。原来人多了，宪兵维持秩序，把汽车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幸亏总理早有布置，我们的同志看到主席出来了，马上过来，宪兵打开了一条路，我们才保卫着主席上了汽车。我们冒了一身大汗。汽车回到红岩办事处，我们才放下心来。

主席这次在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二天。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发表了“双十协定”，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真面目，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在这期间，总理全心全意，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主席的健康胜过关心自己。我们总理既是主席谈判的助手，又是主席的保卫者。总理机智勇敢，在如此复杂的四十多天里没有发生问题，保证了主席的安全。

“双十协定”签定后，张治中陪同主席回到延安。总理收到主席安全回到延安的电报以后，才放了心。

（选自颜太龙《伟大的战士、火热的斗争》）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针锋相对的斗争

——记上党大捷

王 敏 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胜利。

然而，就在人们极度的兴奋之中，却看到了一些令人十分气愤的事情。抗战中，躲到峨眉山上坐待胜利的蒋介石，这几天忽然“积极”起来。在八月十一日一天之内，就发了三道互相矛盾、极端荒谬的“命令”。敌人尚未真正投降，他却“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在“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敌伪武装。他还“命令”各地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军“擅自行动”。与此同时，却又命令他的嫡系部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样当然就给日寇和伪军壮了胆，鼓了气。他们集缩到大中城镇拒绝向解放区抗日军民缴枪投降，有的还耀武扬威地在继续压榨和屠杀人民。

这是怎么回事？形势的发展和前途如何？在这个历史的紧急关头，如何争取和平民主和保卫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

这是人们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

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从延安坐飞机回来了。第二天就在赤岸驻地召开了干部会。邓政委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时局的估计和方针指示。毛主席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基本形势，指出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已定，内战危险十分严重，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坚决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要靠自力更生，争取和，准备打。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把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生动的比作和蒋介石争夺桃子。毛主席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蒋介石没有摘桃子的权利。并且提出，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根据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刘、邓首长具体布置了晋冀鲁豫区的斗争任务。到会干部都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有清醒的头脑，不信敌人的“好话”，不怕敌人的恐吓，我们是骗不了、吓不倒的，要坚决、大胆、迅速地进攻，勇敢、勇敢、再勇敢！

形势变化得很快。我军对白晋线及上党地区敌伪军展开了猛烈攻势，在收复潞城、襄垣之后，把长治、长子、屯留、壶关都包围起来。正在这时，过去畏敌如虎的阎锡山却在蒋介石密令下集中了三个师，在日寇第十四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翼城等地向我上党地区大举进攻。在进攻中，日阎联军使用一切残暴手段，在长子城下竟施放毒气，使我围攻长子的部队两个连的指战员全体中毒。我军在守城敌伪军及日阎军的夹攻下，不得已撤离长子、屯留、壶

关、长治等城，阎军并从我军手中夺去早为我解放的潞城、襄垣两城。

事情很明白，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不是在磨刀了，而是抡着大刀狠狠地向我们杀来了。全解放区的军民都愤怒极了，他们要用自己的铁拳打断反动派挑动内战的魔手。

这时传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毛主席由延安坐飞机到重庆去谈判了。当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指战员们都有些担心，大家对于蒋介石这个残忍、阴险的反革命头子是很不放心的。但当激动的心情稍为平静下来之后，人们就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斗争和毛主席在重庆进行的斗争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决定问题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他总是明里谈判，暗里进攻。只有把他的进攻部队消灭了，才能迫使他暂时收敛反革命的凶焰，谈判才会有结果。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坚决的打击，和平是争取不来的。正如列宁所说：“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

有名的上党战役是以九月二日收复襄垣城开始的。战役的第一阶段是要收复长治周围的县城，歼灭守敌，吸引长治敌人出援，将它消灭在城外，为围攻长治创造条件。我军解放潞城之战，只用了五分钟就登上城头，好象神兵天降。敌军的许多士兵甚至来不及知道自己怎样当了俘虏。屯留战斗和长子战斗是第一阶段中打得很激烈的两仗。守屯留城的敌第六纵队，是阎锡山军队中较有战斗力的部队，有六千多人，火力强，工事坚固。我们攻城部队当时除了迫击炮外，

只有一门山炮。但是战士们的勇敢和机智却是无穷的力量。经过三个夜晚的攻击，坚硬的核桃终于被砸碎了。守城敌人除了被打死的以外，全部当了俘虏，连敌纵队司令也被抓住了。敲掉了屯留和长子这两个钉子，敌人已成为惊弓之鸟，打壶关就没有费多大气力。战役第一阶段的逐城攻击，前后只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长治城及其外围据点的敌军是阎锡山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的三个师一万多人。我们的作战方案首先是扫清外围据点，在攻打外围和城关的战斗中，尽量求得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总攻长治城。

外围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据点很快地扫清了。当部队正在积极准备总攻的时候，连续不停的秋雨越下越大了。地形和道路对我们也很不利。长治城位于上党小平原的中央，它的位置较四周为高，从四面向它接近，象是爬一道漫坡，加上天雨路滑，接敌运动较为困难。由于炮弹不多，炮兵总是作抵近直接瞄准射击，在泥泞的道路上，炮兵在敌人炮火下运动，更是困难多少倍。三个晚上的攻击没有解决问题。

战士们的心情非常焦急，特别是这时又听到两个消息，更使人们急于要迅速解决战斗。一个消息是阎锡山为解长治之围，以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和炮兵司令胡三余率领八个师，配备了大量炮兵部队共三万余人，由榆次出发，沿白晋线正日夜兼程前进中；另一个消息是毛主席在重庆进行的谈判，由于蒋介石加紧对解放区进攻而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情况非常紧急，总指挥部召开了前线高级干部会议，下决心要在十月二日晚间发动最后总攻，不惜任何代价解决战斗。各个部队都进行了紧急动员，加紧进行总攻的准备。

大概是由于被围敌人叫喊得厉害吧，敌人的援兵正在不顾一切地快速前进。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判断，敌人先头部队明天距离长治就只有两天的路程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果今夜总攻顺利，能够解决战斗的话，明天晚上迎击援兵还来得及；如果今晚攻击不成功，明天敌人援兵靠拢了，整个战局就会造成被动。

刘、邓首长站在军用地图面前，细细地看了又看。他们叫参谋找来几个有经验的老乡，亲自详细地问了白晋线两旁几条小河秋雨后暴涨的情况，能否徒涉；在地图上反复查看铁路和公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山沟、山梁和道路。一会儿刘司令员离开了地图，摘下眼镜在室内慢步走来走去，又不时从窗口仰望变幻多云的秋空。时针已指向十二点。刘、邓首长交换意见之后，最后下了决心：停止今晚的总攻，只以小部队积极佯攻，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隐蔽转移北进，以急行军于三日拂晓前到达白晋路两侧的磨盘脑、老爷山的预定战场歼敌援兵，然后攻占长治。根据这个方案，马上作出了战役的具体部署。

长治城的四周静悄悄地，可是千军万马却沿着无数条小沟隐蔽地向北转移。我们指挥部走在最后，当我们从城南绕过城东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担任佯攻的部队在城四周开

始了“攻击”，大炮、炸药的轰鸣，一阵阵机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引起了敌人不停的猛烈还击。这一场由我们导演的“交响曲”，催促着战士们更加紧了北进的步伐。

“快走，快跟上！”人们的心比腿更急，总是互相催促着。虽然已经走得不能再快了，牲口要不断地鞭打着才能赶上队伍，但是人们总还是催促着快走，鞋子陷进淤泥里去了，就光脚和尖利如刃的石子搏斗，一步也不拉下。大家心里只急着一件事，一定要在拂晓时分进到预定的战场。

东路部队进到预定的战场，连简单的野战工事都还没有完成，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和我们的侦察部队接触了。侦察部队一面摸情况和监视敌人，一面把敌人引向我们预定的战场。我们故意闪开一条路，让敌人向我们的布袋里钻。当敌人大部进入我们的预定地区时，担任锁口的部队拦头顶住了敌人，同时我们的几支尖刀部队勇猛地插向敌人的本队和后卫。

战斗一打响，斗争的焦点就吸引在磨盘脑几个主要山头的争夺。敌人很清楚，不控制这几个山头，不但不能掩护部队突围，而且连部队也展不开。我们当然更清楚，控制这几个制高点，就可以把敌人完全压在锅底，敌人不但飞不出去，连还手都很困难。垂死的挣扎，迫使敌人顽强地向我军主要阵地反复冲击。从早晨到下午，敌人进行了十多次集团冲锋，都被战士们用机枪和手榴弹压下去了，好几次我反冲击部队都是以白刃反扑打破了敌人的心胆。

我西路部队因迂回较远，敌人已先我军一步占领了老爷

山。当敌人发现我大部队后，就停止南进，构筑工事，准备扼守。

我军为攻占老爷山，几支主力部队发起了猛攻，敌人死守，双方胶着在山梁上。这时我东侧主力以迂回行动，迅速抢占了两个小山梁，切入敌人的纵深。扼守山上的敌人怕被歼灭，连有利阵地也不敢守，慌忙地向北逃跑。我发觉敌人有北逃企图，立即组织有力部队追击。

追！战士们越打越有劲。我们走山路，敌人走公路，战士们的飞毛腿却赶到了敌人的前面，终于先敌人一步赶到漳河西岸的土落村，控制了河口，截断了公路。傍晚，我东西两路大军分路合围，把敌人全部歼灭。阎锡山给我们送了“厚礼”，三万多人全部“报销”。

援兵全部被歼，长治城的敌人完全丧失了坚守的信心。阎锡山急令史泽波趁我军主力尚未南返之时，赶快撤离长治向西突围，企图进到同蒲线上与日伪军汇合。敌人的这一步棋早在刘、邓首长意料之中，当即组成两支精悍部队进行平行追击。刚结束老爷山战斗还没有得到片刻休息的主力部队，由北向西南翻山越岭日夜不停地追击，围攻长治的部队则由南向西北翼侧抓住敌人，南北两路部队形成对逃敌的合击。广大民兵沿途阻扰，并且还在外围捕捉散匪，对迟滞逃敌起了很大作用，当我北路大军把敌人压在佛庙岭、将军岭一带，各路合围部队的包围圈合拢后，我军发起总攻，只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敌军被全部歼灭，连史泽波在内的近万名官兵都当了俘虏。

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解放了。历时三十多天的上党战役以全歼阎匪军十三个师而胜利结束了。我们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全胜。

在此期间，重庆谈判在进行着。我党不仅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明确方针，提出了实现这个方针的具体办法，同时为了取得协议，争取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也作出重大的让步。但蒋介石自恃武力，始终没有放弃他那独霸胜利果实的独裁迷梦。在十月初，本来协定的初步方案已经拟定了，但在我国围攻长治未下，敌大量援兵沿白晋路急进之时，蒋介石竟把协定方案完全搁置下去，也不再进行谈判。很显然，他是把这个军事行动当作一笔赌注。上党战役的胜利结束，使他的赌注输光了，给他发烧的头脑冲了一桶冷水。他不得不在十月十日签订了《双十协定》，发表了《国共会谈纪要》。当然，实际上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得到教训，就在签定《双十协定》的同时，他仍在积极准备着新的更大的阴谋。这一点，我们是心中有数。在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部队就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补充新兵，总结经验，随时准备给阴谋进犯的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选自《毛主席在重庆》，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一等兵海曼会见毛主席

美国 霍华德·海曼

我从一位过路人嘴里偶然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我顿时呆住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个美国人，在纽约出生、长大并在那里生活。然而，毛泽东却曾非常直接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派我，军号为三二七〇三九八〇的一等兵霍华德·海曼，到驻中国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总部工作。当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

刚一到中国我就看到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到处是卖淫和死亡的现象。许许多多瘦骨如柴的青年拉黄包车，活到二十五六岁就死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亲眼看到过蒋介石的军队扑向一个村庄，见到男人就抓，给他们铐上手铐，打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被“选拔”入伍了。

这一切，而且还不只是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美国政府的正式法令甚至禁止我们在内部讨论中国国内的政局。作为基本军事训练项目之一，我国政府给我上过

课，发过小册子，说明我们的敌人法西斯的本性。这时我却直接置身于一个完全采取高压手段的社会，置身于一个同据说我们正在与之作战的法西斯国家的一切标准完全符合的国家，即国民党中国。

我在中国呆了大约一年零八个月，慢慢地，啊，是十分缓慢地，结识了一些朋友，先是一个，然后两个，最后是一小批中国学生和教师。他们会讲英语。在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互相比较信任以后，他们开始向我讲述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他们使我得知，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法西斯，同时又警惕地注视着时刻准备袭击他们的国民党人的动向。

我的中国朋友向我讲述了延安的情况，那里的窑洞、著名的长征，当然还谈到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当时(一九四四年)，我在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结交了几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的人。他们都很穷，都是从日本占领区逃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遇到这样爱国，这样精力旺盛，充满活力，这样渴望为改善国家状况而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人们。我确信，如果中国掌握在合适的人手里，即便有一半的机会，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家和一个十分美好的生活之地。”

临近对日作战胜利日时，我被调到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重庆是蒋占区唯一允许中国共产党人设立办事处的地方。美国和其他外国新闻记者经常到共产党办事处那里去获取消息、新闻简报等等。但是中国人谁都不敢去，怕随后在蒋介石的人手中“失踪”。

然而我不是中国人，况且中国共产党人总还是我们的盟友。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另外两个美国士兵、我的朋友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也决定去看看。一年半多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延安的中国是另一种样子。甚至每周一次前去为美国设在那里的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美国空军的机组人员也说，“另一个中国”里有些不一样的、令人感到清新的情况，但是他们无法了解到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朋友和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我们开始花费很多时间到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总部去走走。同时，毛和蒋介石正在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这一谈判是为组织联合政府所作的最后的努力。谈判失败了。

在二十二岁上，我为能够看到“北方的”那另一个“中国”的缩影，能够见到它的一些人并同他们交谈而感到特别兴奋。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这种交往达到了高峰。我们知道毛吸烟吸得很多，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自己种烟草。我们就从自己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并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便条，把这张便条和香烟留在中国共产党总部。

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们，毛接受了我们的礼物。作为答谢，他希望我们下周去同他一起吃饭！

我们去了。三个很年轻的美国士兵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另外几个人一起吃了饭。下午和晚上的一多半时间我们花在谈论中国和它的前途，以及设

法回答毛问我们的关于美国情况的很深刻的问题上，但是常常答不上来。

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今年七月，我有幸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批美国退伍军人一起带着我们的家属重游中国。我们重访了我们驻扎过的所有地方。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个新中国，一个人民穿得好、整洁、健康和幸福的国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已不再是我们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时所看到的农村和城市了，今天的重庆也不是三十一年前我所见到的重庆了。看到重庆清洁的街道和大量的住房建筑，看到一个完全靠自己的集体力量建设起来的都市，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我的思路现在又回到了开头的地方。也许我现在有点儿意识到为什么在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我惊呆了片刻。毛泽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教导全体中国人民靠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站起来的指导力量。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我十分熟悉的那一小批中国人是他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而他们，加上我最近看到的新中国则是我的老师。

（原载美国《新中国》季刊）

一张表现友谊的照片

美国 爱德华·贝尔

一九七六年七月在重庆，在一个天气晴朗炎热的下午，我看见了一张放大的巨幅照片，由于年代久照片颜色发黄了，但是画面上的人们的笑容及照片的意义却不减当年。我感到惊讶不止，于是跑出屋子去叫我们美国退伍军人代表团团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在中国驻扎过）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看这张照片。我问向导，是谁把这张照片挂起来的？什么时候挂的？向导说，毛主席曾在这所房子里度过许多时光，制订活动和工作计划，并会见重要领导人。一九五八年这所房子辟为纪念馆开放时，即挂起了这张照片。一九五八年正是冷战年代，在那时，许多美国人是难以理解中国人珍视他们同我国人民的友好接触这种事情的。

这张照片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当时毛主席从延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那时，我与另外两名美国军人杰克·埃德尔曼和霍华德·海曼通过大学里的学生朋友曾会见了周恩来。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次会见，一星期之后，我们被邀请去同毛主席一起吃饭。

我们去参加宴会前满怀着热切的希望，因为愿意抽出时间来同三个普通的美国兵会见的人，是中国历史上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物，是正在忙于处理世界历史上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大事的人物。他认为会见美国兵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重要的事情。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下午，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背着背包，背包里面装着准备送给毛主席的礼物——几条香烟，快步地走过这条又窄又脏的街道来到这所白灰粉刷的房子，登上了台阶。我们一起在楼下的一间房里等待着，在这间房的一端挂着一个竹帘子。不久，竹帘子掀开了，毛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身穿军装，微笑着向我们问好。在场的还有他的译员和其他一些朋友。他显然愉快地接受了我们送的香烟，我们对此感到很高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说我们对他太慷慨了。

我们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旁坐下吃饭时，毛泽东对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专心致志地倾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他问到了我们在国内的生活情况，问到了我们的家属情况以及我们对战后生活的愿望。他不会讲英语，是用汉语讲，但是讲话时却是直接对着我们说的，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席间，毛主席曾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他请我们回国后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他认为，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真正

的友谊。

他满怀深情、十分乐观地谈到了我们的前途，所有青年的前途，因为他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是始终意识到每个小时的重要性的，于是他提醒我们说：太阳快要下山了，如果我们想照像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照。我们到花园里去，大家摆好姿势照了几张集体照，以记录这个愉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我始终珍藏着那张照片作为那次会见的留念。发现中国人也珍藏着这幅照片，真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和激动！当然我指的是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在重庆纪念馆墙上看到的那幅三个年轻的美国兵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期间，无论我们到哪里，人们一得知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与毛作过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时，就真心实意高高兴兴地迎上前来同我们握手，今天使我想起了伸过来与我握手的那数百双手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们在参观工厂、学校、饭店和托儿所时，人们要我们讲述那段故事，我们不知讲了多少遍。我确信，对毛的这种热爱将进一步加强和鼓舞已经攀登得如此高的中国人民继续前进。

（原载美国《新中国》季刊）

心上挂着美国

美国 杰拉尔德·坦纳鲍姆

我们小心谨慎地走过通往八路军办事处的那条阴暗的小巷，留心有没有国民党特务盯梢，特别是马路对面茶馆里的那些特务，据我们所知，他们日夜在进行监视。

这事发生在重庆，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初。重庆是蒋介石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时首都。重庆城里已经谣传纷纷，老式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在拥挤不堪的大街上穿梭般地来来往往，更增加了人们的各种猜测。

毛泽东主席已经乘美国的一架军用飞机从神话般的延安来重庆同他的宿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是为了防止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内战而作的一种努力。

我刚从美国来到重庆。经过一些美国朋友的介绍，我几乎马上会见了许多中国要人，并同他们谈了话。他们在会见前已得知我同情中国的进步运动。我和韩丁（他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在重庆已呆了一些时候了）从龚澎——周恩来的一名机敏、活泼的助手——那里接到了访问八路军办事处的邀请。

我们两人都很想亲眼见见这位伟人。作为勇敢地领导反抗日本侵略和最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斗争的领导人，他已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传奇式人物。

走进办事处接待室，看到轻松愉快的工作人员以及龚澎的满面笑容和向我们伸出的手，大街上的那种恐怖气氛在我们脑海中就烟消云散了。龚澎示意我们经过接待室走进会客室。当我们经过一间小会议厅时，看到毛主席正在给从解放区来的一批干部和记者谈话。

他左手叉腰，右手打着有力的手势，随着头部的摆动，浓密的黑发一动一动，使讲话更加生动有力。他宽宽的脸部表情很严肃。说来怪难为情的是，当时我和韩丁汉语懂得不多，听不懂他的话。

我们注意到，他穿着在延安时穿的朴素的布军装，洗得很干净，但皱折很多。他脚上穿着一双农民穿的布鞋。我们看到他在作显然是重要的谈话，于是停下脚步在一旁站着，直到龚澎彬彬有礼地催我们去会客室才移步。

等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会议室里传来一阵掌声。接着主席很快就出现在门口，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他身材比我原先料想的要高得多。对比之下，他的手似乎不大，握手时几乎只碰了一下手指头。他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但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他的眼睛似乎半闭着，显得很安详，但他的思想却很敏捷。

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但却难得有机会问。他心上挂着美国，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的问题中可以明显看出，他

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过很多讨论。有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但是他希望听听不同的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得到的答案的逻辑性和内容。

毛向我们详细询问美国劳工运动的情况，探究一些工会和领导人的具体情况。他很关心罗斯福死后刚刚升任总统的杜鲁门的情况。由于同蒋介石打交道也就是同杜鲁门打交道，因此毛想了解杜鲁门其人及其思想，因为这两点对他来说都是未知数。

主席的问题问完后，向担任翻译的龚澎几乎使人不易察觉地点了一下头，就结束了这次会见。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事，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但是他希望你们尝尝我们准备的几个简单的菜。”

我们同主席握手告别时感谢他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他点点头，转过高大的身躯，步履轻快地走了。这是我们终生不忘的一次会见。

(原载美国《新中国》季刊)

七十回忆录（第六章节录）

张 治 中

第三节 抗战胜利以后

一、迎接毛主席来重庆——一到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主席到重庆会商国事。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主席慨然电复应约。于是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于八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主席到了重庆。

这是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主席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

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主席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九月三日下午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①全文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其讨论事项如下：

1. 和平建国大计；

2. 民主实施纲领；

3. 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 重选国民大会；

5. 复员善后问题。

(二) 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 解放区解决办法：

1. 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和委员由中共推荐；

2. 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 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 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四) 实施善后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 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个师；

(二) 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 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 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五) 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 安置编余官佐；

· (七) 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 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 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法之必要办法：

(一) 释放政治犯，

(二) 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 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等）

九月四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我们四个人，其全文如后：

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提案一并发表，并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成记录，通知美国和苏联大使。余日前与毛泽东谈话要点如下：

一、军队问题：关于中共军队之编组，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

行不通者。吾人应本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

三、政治问题：日前谈话中，毛泽东询余对此一问题如何解决，余答以现在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但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四、国民大会问题：毛泽东氏询及国民大会将如何召开，余答以已经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国民党方面对周恩来、王若飞九月三日所提的谈话要点写成一个答复交给周王两氏。

全文如下：

第一项：

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至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民主固为统一的基础，统一亦为民主的基础。

第二项：

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

第三项：

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曾承说明“平等非均等”与“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旨，甚佩。

第四项：

“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雪艇先生曾谓政府至多只能作下列之然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余等甚赞同。

第五项：

此在原则上绝无问题，惟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第六项：

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第七项：

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通过。

第八项：

此条仅举原则，自无问题。

第九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或如蒋主席与毛先生所谈，“现在战事完结，拟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选任人员参加，共同参与政治”，或如毛先生与雪艇先生所谈，“由蒋主席约集其他党派人士及无党派若干者（名额及人选可由蒋主席酌定），与政府及中共代表开一会

议，以极短时间通过政府与中共所商谈之结果，此一会议即可名之为政治会议，不必常开会，有必要时始再召集”，可再商谈决定。至其讨论事项，似可不必预为规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蒋主席曾谓“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使其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毛先生曾表示“如政府坚持旧代表必须有效，中共不能与政府成立协议，但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国民大会”；吾人可再继续商谈。并据以提于政治会议。

(二) 此在原则上甚同意，惟希望不因此影响国民大会。

(三) “解放区”问题已如第四项所答复。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蒋主席与毛先生谈：“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其指示极为明白。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市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希望以革命者之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解决此一问题。

(四) 此为政令统一后必然应办之事。

第十项：

(一) 关于军队整编问题，蒋主席已与毛先生面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与去岁国民参政会时不同，但余当时所作可将中共军队编为十个至十二个师

之诺言，仍然有效，必当负责做到”，“全国军队缩编情形，亦迭由文白、辞修诸位先生面告，故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之最高限度，务望郑重考虑。”

(二) 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于依令编组后实施。

(三)、(四)、(六)、(八)、(九) 均无问题，其详细办法，倘中共有意见，均可提出商谈。

(五) 北平行营主任，不宜规定由中共推荐，北平政治委员会的设置，更不相宜。

(七) 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第十一项：

(一) 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二) 雪艇先生曾提出：“抗战终结后，关于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事，当给与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已得毛先生赞同。

(三) 此项可赞同周恩来先生面谈之意，只办情报，严禁有逮捕拘禁等行为。

二、“双十协定”

从这个“谈话要点”和“答复”看，显然双方的距离是

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队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师。又如中共提议设置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拒绝。……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十月十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主席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外间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其全文如下：

(略)

从这个协议里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

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

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

了，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

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商谈中始终没有得到过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一定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意；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三、欢宴毛主席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的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十月八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

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毛先生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也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怀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不免有若千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存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极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们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

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先生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略）

四、二到延安

到十月十一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在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作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编者注①：重庆谈判在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头四天为任意交换意见。九月二日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王世杰商谈，商谈后王世杰追记的会谈要点，题为《今日谈商之结果》——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兹录于后：

谈话时未作任何笔录，以下系杰于会谈后自行记录。

谈话时毛、周、王均在座，但谈话完全由毛氏主持。

一、政治会议问题：

毛氏之主张如下：

(甲) 此次双方商谈有结果时，由政府与其他党派人士，亦非正式与之交换意见。

(乙) 交换意见后，由蒋主席约集其他党派人士及其无党派者若干人(名额及人选也由蒋主席酌定)与政府及中共代表开一会议，以极短之时间通过政府与中共所商谈之结果。此一会议即可名之为政治会议，该会议亦不必常开，以后有必要时，始再召开。

二、国民大会问题：

毛氏之意见如下：

国民大会问题，如政府坚持旧代表必须有效，则中共不能与政府成立协议，但中共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国民大会。

三、自由问题：

毛氏完全赞同下列文字(其大意系余所拟)

“抗日结束后，关于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事当给予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关于政党问题：

毛氏表示谓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但亦不反对制定政治结社法，惟谓结社不宜受限制。

余谓小党林立，法国之复辙可以为鉴戒，彼谓中国情形不致蹈法国复辙。

五、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毛氏谓应列入共同声明之文字中。

余谓此事政府准备自动办理，恐不愿列入共同声明。至何人宜释放，彼可酌提人名于政府。

六、关于所谓“解放区行政”问题：

余谓此事政府至多恐只能作下列之然诺：“收复区（余不赞同‘解放区’名词）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此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

毛氏对以上意见未提异议，惟续询对此区域内之地方民选团体将如何处置？余谓制度恐不可分歧。

七、关于中共军队问题：

（甲）毛氏谓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师。

余拒绝讨论，只请注意者两点：十二师之数系中央尚未裁军时所定之数。中央最近数月已裁去八十余师。

（乙）军队指挥问题：

毛氏表示谓宜以北平行营给予中共将领，俾秉承蒋委员长之命，指挥中共在山东、江苏、河北、热、察、绥等地方军队。

余谓此不可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中或可有中共将领参加。

八、受降问题：

毛氏最后表示谓南京总受降纵同盟国规定，不能加派中共人员，分区受降必须指定若干中共将领在其区域内执行。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节录）

第五章 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

**对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形势，不断增加的内战危险，
1945年秋同赫尔利大使的讨论，11月27日赫尔利辞职。**

美国人对中国人一向是友好的。不少美国传教士、美国医生和美国教授曾在中国住过很多年，他们所努力宣传的基督教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国内人民的热诚的支持。此外，在许多美国人的记忆里，中国摆脱了君主政体的枷锁，并开始把它自己从那个古国的根深蒂固的中世纪制度中挣脱出来。然而这个斗争在1931年还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日本已开始进行长时期的侵略计划，而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个侵略计划竟把这个曾经一度是大帝国的广大的土地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

1945年秋，美国被迫面临着多年来在中国所形成的严重的复杂局面。对于中国内部的分裂程度、国民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的脆弱、以及该国政府中缺乏人民的代表，所有

这些情况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的。

我们在美国往往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自从1911年满清帝国覆灭以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倡导一种说法，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因为他指望着将来，并希望以此去鼓励中国人民。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就在赫尔利大使于1945年秋回华盛顿之前，他拍回来一个电报，其中包括有我们战时对华政策的总结。

赫尔利大使写道：“华莱士副总统于1944年从中国回来时告诉罗斯福总统说，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接着两位美国参议员（布鲁斯特和钱德勒）预言道，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这种看法在美国和中国的文职与武职官员中间是非常普遍的。罗斯福充分了解了这种形势之后才派遣我到中国去作为他的私人代表的。罗斯福总统给我的指示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防止中国国民政府垮台。

“（二）维持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

“（三）调和中国和美国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

“（四）联合中国的抗日力量……”

“可以概括地说……在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军事性的。即使是经济性的指示也带有军事上的目的……”

赫尔利和作为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在实现头三点中做了许多工作。然而，最关紧要的一点还有第四点。

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

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在中国还有近三百万的日本人，其中约有一百万以上是军队。除非我们确知这股力量是被消灭掉了，否则，即使日本人是被打败了，他们仍可以光靠他们在争夺统治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国。

另外一个办法也是同样行不通的。这个办法就是，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人从大陆上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人从东北撤退，必须将无限制的物资和大量的美国军队投入中国去。美国人民是永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

因此，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阉墙之争。

魏德迈将军在抗日战争的最后日子里，曾以这样的话来描述这种情况：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对于军阀和横暴无比的、不称职的官员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有许多怨言的。可是，要满意地解决中国问题或世界秩序问题是决不能靠在这个地区进行内战来完成的。

“根据有限的材料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缺乏民主精神或民主的意向。由于95%的中国人民是文盲，也由于其他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中国是不打算成立一种具有民主形式的政府的。无知的中国人民大众需要和平，他们对于现有的各种思想并不特别感到兴趣，也并不懂得那些。他们最关心的乃是工作机会，为他们的家庭获得食物和衣着以及一个幸福的和平环境。

“这儿的情况最好是能够让一个仁慈的暴君或者是一个军事独裁者来掌握，至于这样的独裁者是共产党人，或者是

国民党人，那倒是无关紧要的。根据我的观察，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官员对他们的自我扩张都感到兴趣。我有这样的印象，蒋委员长的领导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着重点为作者所加——编者）

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表示了友谊。举例来说，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拨款就超过了十五亿美元。当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我们在外交上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这次会谈的结果订立了中苏友好条约。

赫尔利大使致力于使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政府坐在一起，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大使在给我的一系列的长篇电报中告诉我他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他起初到中国去并不是以我们的外交代表身分而是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身分去的。在他给我的许多电报和报告中，他评论了国务院，对一些职业外交家的判断和能力表示怀疑。和我一样，他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成为亚洲的反帝国主义拥护者。赫尔利抱怨说，国务院对他的报告与建议没有给予他认为应该给予的优先重视。

最后，在1945年9月10日，他又再度陈述——正如他以前几次所陈述的那样——他所了解的罗斯福总统的在亚洲的长期目标。他陈述了他在促进这些目标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引述了几个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作为例证，他认为这些决定的目的就与他所认为的最明智的办法不同。于是，他要求准许他回华盛顿。他打电报给国务卿说：“我愿意有机会和

你及总统讨论美国对亚洲政策。”

赫尔利回国之后，他便与国务卿贝尔纳斯到白宫来，一星期之后，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人来白宫作了一次更详尽的讨论。我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是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

赫尔利告诉我说，尽管有他与魏德迈所承认的一切缺点，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前景还是很可乐观的。在经济方面，中国的潜力与1937年以前几年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区别。当前的主要问题看来还不是生产而是分配。在财政方面，我们的不断的援助使中国处于一个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在政治方面，赫尔利将军刚刚成功地使得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政府的领袖们举行直接谈判。谈判的结果，中国的领袖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于赫尔利第一次到白宫来的前两天即10月11日公布了。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赫尔利亲自看到了签订这项协定的筹备工作，他告诉我说，中国走向真正的和平是有希望的。这项协定要求召开一个制订新宪法的制宪会议——国民大会，并规定了使得一切党派均能参加的条款。显然，蒋介石在这个会议中将占有优势，因为他在会议中的代表人数要比共产党多。

一个包括有四十个人的临时委员会——由蒋介石指定的，但半数以上的人都不是国民党人——将处理这些事务，直到新宪法付诸实施为止。蒋介石对这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加以否决，虽然该委员会五分之三的票数就可以拒绝这

种否决。

这是一项很好的协定，我对赫尔利所做的使这项协定成为可能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然而，这项协定却从来没有产生效果。

那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在开往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他的一大部分军队是靠我们的空军的运输机来向北方运送的。我们的五万名海军陆战队也在好几个重要港口登陆了，所以，通过这些港口，日本人的遣返工作就能继续进行。共产党人要国民政府停止运送这些军队，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利用这种形势来加强反对他们的地位。他们对这一点也没有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们尽可能地切断铁路线，重庆政府很快地开始收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了协议，在向东北移动。由于互相攻击有增无已，双方的敌对情绪愈来愈增长。

11月4日，我们驻重庆的大使馆报告说，内战看来将要爆发，原定于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停止召开了。11月25日，中共驻重庆的主要代表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第二天，他的第一副手也接着回去了。这时，武装冲突的消息已时有所闻。我与赫尔利于11月27日在白宫讨论了这个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是他立即回到重庆去。他向我保证说，他只待办完几件私事后就回中国去。

这次谈话大约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但是不到二小时，当我正在与内阁成员们举行每周内阁午宴时，有人找我去接电话。这是驻白宫的一个记者从全国新闻俱乐部打来的电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告诉我说，赫尔利大使刚才在俱

乐部发表了一个强烈的演说，对政府、国务院，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我个人进行了攻击。

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直到现在还想不透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赫尔利必须到中国去，内阁一致同意了。第二天，赫尔利果真向报界发表了一封“辞职信”；但是事实上，不管他发表或不发表那封信，他都会不干的。

赫尔利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几个星期之后——1946年1月——他特别来找我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他对罗斯解释说，他很想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为我效劳，他希望罗斯告诉我，说他辞职时没有蓄意说过任何对我个人进行批评的话。

“他要求我相信，”罗斯对我说，“他是‘与你站在一起的’。”

赫尔利继续对罗斯说：“贝尔纳斯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他没有从国务院掌管机要的人那里得到充分的情报……贝尔纳斯对中苏关系没有理由激动，因为这些关系在去年7月或8月的中国和俄国所签订的协定中全都写下来了……”据赫尔利说，贝尔纳斯感到不必担心的理由是“斯大林遵守他的诺言”。

中国现在看来是被引向更麻烦的境地去了。我们不能派遣军队之类来保证蒋介石的优势。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是发挥我们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担任此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和极高超的才干。就在赫尔利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的那一天的内阁午宴上，马歇尔将军的名字被提

出来了。他刚刚把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移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恐怕没有人比马歇尔更应该享受光荣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了。可是我想不出来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担任出使中国的艰巨任务。

（原载《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71—77页）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节录）

八月一个月，共产党代表和国民政府间的谈判一直继续进行着。毛泽东由专为此目的而去延安的赫尔利将军陪同，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抵达重庆，在那里逗留了约一月。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是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大使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二日离重庆去美国述职，在四天以后抵达华盛顿。在他离开前不久，他提出了下面关于当时正在重庆进行着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代表间的谈判的报告：

“（一）谈判者同意他们将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复兴中国及制止内战而合作。

“（二）双方同意支持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三）他们又同意双方将拥护孙中山的学说，并将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

“（四）共产党同意他们将承认国民党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党，并将在从目前的政府形式过渡到民主政权的时期

内，与其合作。

“（五）不少其他问题，包括释放政治犯、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与结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协议。

“还有两个重要点，会议者尚未取得协议，虽然双方对于使协议的取得有可能曾作让步。其中一点是共产党主张在某些省内有任命、选择或选举省县长之权利，而政府则认为直至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政府之时为止，任命省长和官员的特权应属于共和国总统。……政府觉得直至从目前政府到宪政的过渡时期完成为止，这种办法不应有所改变。双方同意在过渡时期共同合作。另一点双方亦已达成一种协议，但并未最后同意，此即包括在中国和平时期国家军队内的共产党部队的数量。政府指出目前计划要求一个包括八十至一百个师的和平时期军队，而国民党认为是少数党的共产党却主张约摸占和平时期军队半数的权利……国民党拒绝同意此点，而提议予共产党以二十个师，这将约摸占计划中的和平时期军队的五分之一。毛泽东主席声称，他们并不拒绝这个提议，但共产党愿意再加以考虑。

“此次会议的全部成就是在于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使中国分裂政策的分子预测要有内战的时期，进行商谈和平时期的合作。会议是将继续的，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时候他们如果不愿意继续会议，当予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昨晚我告诉共产党和政府的谈判人员，根据我的意见，他们企图在解决太多的细节。……我说如果他们对基本的笼统原则能表同意，那末根据这些原则，细节就能迎刃而解了。

“谈判人员之间的精神是良好的。中国两大党之间的接近问题似乎正在进步中，只要会议继续，内战的讨论和流言是会消失的。”

重庆大使馆报告称，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和中国政府谈判人员双方的诚恳请求“对于获致协议予以帮助”，大使把离华日期从9月18日延至9月22日，为了在中国多逗留四天。大使馆又称，“为予国务院以情报，双方曾对大使的合作与帮助表示深切的感激。他们同意在他们所提议的最后决议中列入一节，对于大使在促成会议和在谈判过程中以调解者的地位所给予的一般帮助方面对中国的巨大贡献，表示谢意。”蒋主席在1945年9月17日致杜鲁门总统函中提到，“赫尔利将军的优美政治家风度和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爱，他们从他那里看到了公平正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适合的象征。我曾就关于许多问题的我政府的政策与赫尔利将军作非常诚恳的长谈，我曾请他报告你，总统先生，很多关于完成中国与美国间为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继续紧密合作的因素。”

在重庆的继续和谈

大使离华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间的和谈继续在重

庆进行。十月初，中国政府宣传部长吴国桢要求重庆大使馆递送下列致赫尔利将军文：

“中国共产党业已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提议，他们在国军中被分配二十个师，由一个整编委员会来决定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可以被编成二十个师。中国共产党将由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和他所指定的一些其他官员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国民政府将由军政部次长林蔚将军和作战部次长刘斐将军代表参加。

“此外又协议在实施宪政前，由国民政府成立一个由三十七人所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考虑并建议关于（一）提交国民大会的宪法草案；（二）国民大会应否按照计划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或延期；和（三）和平复兴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议这个委员会采取一种‘绝对否决制’。国民政府代表尚未同意这个附带条件，因为它将使所有提议在发生效力前取得一致的批准。

“政治委员会的讨论应该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它的决定具有最高的效力，它所通过的决议应由国民政府依据法定手续实施之。”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飞返延安。就在他离开以前，周恩来将军与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员论及和谈的进行。从这次谈话显示国共联合声明正在准备中，大概在毛氏去延安之日公诸于世。十月十一日，官方声明公布了协议的内容。周氏称唯一留下的要点尚待获致一定性质的协议，即

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区的政府问题，他特别提及河北、山东及察哈尔等省。据周氏称，中国共产党要求解放区的省长由区和乡所选举的参议会推定之。他又称政府同意区和乡的选举，但坚持省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根据大使馆的意见，关于目前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区的政治统治的基本问题，双方距协议尚远。十月十一日，政府与共产党联合公布了协议的原文。这个协议的重要特色是在于它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实施业已同意的一般原则。后来马歇尔将军帮助了这方面的努力。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重庆大使馆报告称，据悉王若飞已由延安返回，四川省主席张群数日内即将到达重庆，在他到达后，他将会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代表中国政府与共产党的周恩来和王若飞恢复商谈。商谈即包括有关下列主题的事项：（一）政治协商会议；（二）解放区；和（三）国民大会。一般希望商谈将延续至约十日之久。在商谈结束后，周恩来将携提议返延安，由中国共产党当局据而作决定。然后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定代表来重庆出席预计十一月初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业已决定被派与共产党代表前来重庆，他自己或许就是一个代表，同时他又将是讨论军事问题的三人小组的共产党代表。重庆的大使馆感觉，共产党代表对于中央政府和共产党间的最后协议的可能性，较之以前“确定地更为乐观”，并对报纸宣布赫尔利将军不久将返回中国的消息表示非常满意。

中国宣传部长吴国桢博士虽于十月二十七日公布声明，指出国共商谈正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着”，但是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王炳南却报告大使馆，称最近的和谈并无进步。他表示意见称，政府显然有意拖延，为获得对于共产党所解放的区域的军事控制，他并且说出了共产党的愤慨，即关于他所谓“美国干涉”，美国派遣部队至华北的许多据点加以占领以待政府部队的到达，很大部分的政府部队业已由美国空军运往北方。据大使馆声称，他先则闪避关于满洲情况的诘问，但继称在该区域内仅有少数八路军人员。重要地，他说，普通人民业已发动起来了。他表示意见称，苏联不会过问中国的内争，而宁愿让中国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除非美国积极援助国民党，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可能采取必要的行动。

（选自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169—172页）

附录：

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

王抡樞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当时我在重庆《中央日报》担任编辑，与编辑主任卜少夫轮流编辑国内要闻版，所有编好的稿件由总编辑陈训恣审核后发稿。从该报对有关“重庆谈判”新闻稿件的处理，就可看出当时国民党内部对“重庆谈判”的态度，以及国民党中央对“重庆谈判”的宣传方针。

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该报的编辑方针必须符合蒋介石的意图。抗战期中，先后在重庆《中央日报》当过社长的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等人，皆因触怒蒋介石而被撤职。《中央日报》

在组织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但有关新闻言论方针实际上是按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意图办事。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主管机要，代蒋介石草拟重要函电、文告，参与拟订国民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他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知道蒋介石的喜怒，他对《中央日报》的指示更能反映蒋介石的要求。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的社长胡健中，属国民党CC系，在浙江办《东南日报》起家。平时他对报社编辑部和主笔室的实际业务很少过问，一切由陈训恂和陶希圣负责处理。陈训恂是陈布雷的亲弟弟（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担任报社的总编辑；陶希圣当时是陈布雷的主要助手，曾代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担任报社的总主笔。这两个人都住在侍从室第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陈布雷请示；蒋介石有什么重大措施，陈布雷也经常向陈训恂、陶希圣打招呼。有时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的新闻、言论，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步调不一时，中宣部若来询问，报社只要答复“这是布雷先生的意见”，中宣部也就不再过问了。

出我们意外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毛主席，邀请毛主席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们事先竟毫无所悉。直到八月十五日深夜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发到《中央日报》编辑部时，大家才知道。当天夜里，社长胡健中也来到编辑部与陶希圣、陈训恂商谈此事。从陈训恂的谈话中，透露出蒋介石的这个电报不是陈布雷草拟的，

同时陈布雷也未参与这件事情的策划。陈训恣说：“这是他（指陈布雷）的习惯，不叫他办的事他从不过问，也不议论。今天他只这样说，蒋先生（指蒋介石）是不会错的，我们要无条件的信任他，支持他”。他们三人共同认为，毛主席决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陶希圣明确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他们三人研究决定，这类新闻稿件概由陈训恣亲自处理。

为什么要“假戏真做”？事后我们才知道蒋介石的这些电报是政学系的头目吴鼎昌代拟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不赞同这一搞法。吴鼎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抗战胜利时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解决国是问题。这个办法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头目如陈立夫等的反对，蒋介石却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叫吴起草电报，参与此事的策划。这样，更引起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对政学系的不满，在内部散布空气，认为国共谈判决不可能。这就是《中央日报》采用“假戏真做”宣传方针的由来。

八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国内要闻版上以三栏的地位用大字标题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电报中说什么“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摆出一付渴望和平的样子。

八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发出号外，全文刊载八

月十六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朱总司令在电报中提出对日受降问题，并要蒋介石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主席在电报中向蒋介石严正表示：“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两个电报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蒋介石紧接着发出第二个邀请毛主席来渝的电报，对朱总司令电报所提对日受降问题，进行狡辩，胡说什么对日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规定，中国只能照办。对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要问题，蒋介石的电报中只字不提，只讲空话，说什么“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上以同样的手法刊出蒋介石给毛主席的第二个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这个电报是蒋介石八月二十日发出的，韵目代日为胥字，所以叫“胥电”。八月二十一日《新华日报》把蒋介石这个电报摆在第二版以短栏地位刊出，并特别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蒋介石先生胥电读后》，对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无理说法加以驳斥，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荒唐命令表示抗议。这篇社论戳穿了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和两面派的手法。国民党图穷匕见，悍然下令重庆新闻检查所把这篇社论扣押了，《新华日报》为此在报上开了天窗（按：当时国民党规定，报纸的新闻言论被扣押后，报社要另找材料填

补空白，不准开天窗）。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编辑部分析这一形势，陈训恣说：“这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胡健中说：“立夫先生（指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八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刊出“本报延安特讯”，以三栏地位大字标题排在第二版上部，标题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新华日报》这条消息引起了《中央日报》编辑部的重视，胡健中说：“这次搞得不好会弄假成真，我们陷于被动，下一步就难办了”。陶希圣说：“周恩来本来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特讯还不足说明我们原来的估计是错的”。陈训恣也认为毛主席本人不会来重庆，《中央日报》原来的编辑方针是正确的。当天夜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报道了蒋介石第三个邀请毛主席来渝的电报，声称“特再驰电速驾”。陈训恣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仍以处理前两个电报的编辑手法发稿，并说：“假戏真做就要做到底”。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重庆，宣布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一惊人消息等于晴天霹雳，震动了国民党内部。当天夜里，重庆《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中央指示。陈训恂来报社向我们说：“共产党这一着出乎我们意外。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了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毛主席亲临重庆的喜讯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驻渝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主席抵渝盛况，盛赞毛主席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重庆的报刊竞相刊载毛主席来渝谈判的消息，发表了毛主席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书面谈话的全文，很多报纸发表了社论，拥护毛主席的主张。有的报纸在社论中指出，毛主席来重庆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毛主席“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新华日报》当天下午发出号外，首先传播毛主席来渝的喜讯，山城人民争相阅读，奔走相告：“毛主席来了！”人心振奋，万众欢腾，整个山城沉浸在幸福和狂热的气氛之中。

《中央日报》则是另外一种情景，面对这一重大新闻，

编辑部感到不好处理，既不便写本报特稿，又不能发表社论，连前几天发表蒋介石电邀毛主席来渝的新闻那套“假戏真做”的编辑手法也不用了，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的地位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报纸版面冷冷清清，表现出无话可说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心情。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虽然不发表社论和写本报专访稿，但报社的主笔室和采访部却是紧张的。总主笔陶希圣每夜必与主笔王新命、胡秋原、戴杜衡、钱纳水等频频商议，分析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动向和意图。采访部的采访主任徐苏灵与记者张仁仲、赵浩生等，以谈判为中心，四出摸底，写成材料供编辑部参考。CC系头子陈立夫还临时派一个中统特务卜锐新来《中央日报》担任“记者”，专门刺探有关“重庆谈判”的情报。卜锐新到报社后，行动诡秘，经常吹嘘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与龚澎同学。当时龚澎在周恩来先生处工作，周恩来先生接见外国记者时，常由龚澎担任翻译。卜锐新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借口燕京大学同学名义，经常到重庆市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纠缠。他每夜回报社后写的情报，不交采访部，直接交陈训恂或陶希圣。

《中央日报》有意贬低和缩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重庆谋求和平的巨大影响的伎俩，不但在社会上收不到丝毫成效，就是在报社内部也未起到作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重庆市黄家垭口该

会会所举行酒会，邀请毛主席参加。《中央日报》社与中苏文化协会同在黄家垭口，分据在街的两边。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报社的职工正在食堂吃晚饭，突然有人跑进食堂低声说：“毛主席来了！”报社的工人纷纷涌出报社大门去看毛主席。这时黄家垭口一带人山人海，万人争看毛主席的热烈情景是重庆前所未有的。直到深夜编辑部发稿时，排字房的工人还在畅谈亲睹毛主席风采的动人场面。事后胡健中说：“报社哪些工人去看了毛主席，经理部都调查清楚了，开来一份名单问我如何处理。我说算了，算了，装着不知道算了！处理起来，影响更大，上面知道了更不好交代”。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关于谈判的报道很少，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也力求简单，并排在不重要的地位。就是蒋介石与毛主席举行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也只在国内要闻版中用两栏标题刊出，不摆在显著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谈判”开始进入紧张阶段，《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训恂突然以中央宣传部特派员的名义，于九月五日率领陪都记者团飞往南京出席受降仪式，并把编辑主任卜少夫也带往南京。对《中央日报》编辑部来说，这等于枪声一响，作战指挥部的骨干就先溜走；这个仗如何打法，大成问题。陈训恂行前向我们说：“‘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以后发稿仍本原来的方针，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力求稳当，只要不出乱子，不给共产党以口实就行了。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抢先到外面去接收。我这次到南京出席受降仪式，这是幌子，主要是为了

复刊南京《中央日报》，所以把卜少夫带走。你们也要陆续到南京的，要作好思想准备。”陈训恣等于九月五日下午飞抵南京，利用敌伪设备，九月十日就抢先把南京《中央日报》复刊。

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国民党的政治骗局宣告破产，国内外进步舆论纷纷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不断抨击国民党反动独裁，蒋介石陷于孤立。这段期间，对国民党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中外报刊均提出严正批评，重庆、成都等地的报纸和杂志先后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这一法西斯措施。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成都十六个新闻、文化团体宣布自动拒检，各地纷纷响应。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于九月十二日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向外国记者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十月一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据陶希圣说，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应付“重庆谈判”；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攻击，博取美国人的好感，使美国政府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陶希圣还说，美国报纸漫骂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向美国政府提抗议吗，美国政府说他们是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对报纸的新闻和言论政府从来不加干涉。我国报纸偶尔出现有批评美国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美国政府若提抗议，我们就要向美国政府解释和道歉。因为我们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报上的材料都是经过政府审查的，政府要负责任。现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国内的麻烦增加了，国外的麻烦就

减少了。

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于十月十一日胜利返回延安。十月十二日《会谈纪要》全文在重庆各报发表，多排在显著的地位；《中央日报》仍按原来的编辑方针处理，编排在国内要闻版中的次要地位，不作为头条新闻发布，但破例地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这篇社论是陶希圣执笔，对《会谈纪要》内容加以歪曲，重弹“军令政令统一”的老调，胡说什么“解决问题固贵迅速，尤贵彻底，以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消灭团结的障碍”，为国民党下一步破坏《会谈纪要》，发动反革命内战，制造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将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沁园春》咏雪一词书赠柳亚子先生，这首光辉词章在重庆传出后，引起巨大反响。《中央日报》特别为此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打出“反帝王思想”的旗号，肆意歪曲和攻击。当时决定由《中央日报》的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负责组稿，约有反动文人许君武等写稿。结果来稿很少，王新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调往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室工作，临行才交出一篇以“东鲁词人”署名写的反动词章，于同年十二月四日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作头条刊出。

原来约定的稿子，以后也很少交来，原定计划遂告流产。

《中央日报》乃建议由重庆《扫荡报》负担这一任务，《中央日报》收到稿件时，交《扫荡报》集中发表。结果是句空话，《中央日报》并无稿件交去，《扫荡报》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关系，纠合反动文人易君左等写了些反动词章，在该报发表，鼓噪了一番。

“重庆谈判”期间，在国内和国际宣传上，国民党都陷于被动，处于劣势。胡健中有一次在编辑部说：“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在国际宣传上我们也搞不过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那样庞大的机构，集中了那样多人材，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就住国际宣传处里面，我们派专人和他们联络，给以交通和电讯的方便，但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总不大感兴趣，对曾家岩五十号说的话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重庆谈判”后，重庆《中央日报》社在主笔编辑聚餐会上总结了这一阶段工作，陶希圣说：“重庆谈判期间，我们报纸的宣传工作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其实是有成绩的。这次谈判我们本来是打被动仗，只要没有出乱子，没有替共产党扩大影响，就算不错了”。胡健中却说：“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要注意领导这个时代。前两天我向立夫先生（CC系头子陈立夫）谈这个问题，立夫先生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

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我上面这番话立夫先生听不进去，就不好深谈了。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这是很危险的”。

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极端孤立，也根本不可能领导这个时代。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尽管要尽各种鬼蜮伎俩，终于被奔腾向前的时代洪流席卷而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任何反动派也抗拒不了的。

（原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 派驻桂园警卫班的回忆

李介新

我叫李介新，又名李曙梅，解放前曾充当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长、组长多年。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我奉命乔装成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特别警卫班班长，负责所谓警卫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方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同周恩来总理一道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独霸胜利果实，到处“劫收”，利用对日受降，阴谋发动内战，一举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经过八年抗战，饱受流离之苦的山城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反动阴谋，对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

以屠杀共产党人起家的蒋介石，一贯口是心非，心狠手毒，但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摆出和平姿态，妄图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毛主席是作为蒋介石的“客人”来到重庆

的，蒋介石借安全保卫之名，妄图把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及各界爱国人士隔离开来，指定伪宪兵司令张镇在毛主席城内住地曾家岩桂园专门派出了一个警卫班。张镇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学生，对此极为重视，作了种种安排，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于警卫班的人员作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

一、煞费苦心的伪装

我们警卫班的编制，在名义上属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从表面上看，它和一般的要人住宅、军事机关、伪国民政府和各院部会的日常武装警卫基本相同；实际上这个班是一个特殊组织，它并不属于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的编制，而是由该部所属宪兵特务组成、受宪司驻重庆直属特高组领导。公开的编制、番号，不过是个伪装。

知道一点宪兵内情的人就很清楚，宪兵内部分为“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两种。“常务宪兵”即武装宪兵，包括宪兵第一团到宪兵二十七团和宪兵特务营、宪兵独立营、军乐队等几个部分。“特务宪兵”由宪兵司令部情报处情报科直接指挥，内部番号在重庆的叫“直属特高组”，其成员有的是充当过武装宪兵的官兵，有的是从社会中吸收来的反动分子，也有共产党的叛徒。他们都受过专门的宪兵特工训练。为了便于深入各种社会场合，搜集有关政治、军事、外

事、社会情报，并对当地的武装宪兵团作秘密监视，起着宪兵司令部的耳目作用。为此，他们大都设法深入社会，以各种职业（如商人、职员、店员、教员、学生）为掩护。在外表上，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穿中山服或学生装的不等，人人都留有头发，与“常务宪兵”完全两样。

这两种宪兵——“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虽然都是由宪兵司令部统一领导，但在人事、组织等各方面，各有各的系统，从不发生横的关系。

伪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的特别警卫班，名义上系属“常务宪兵”，实际上所有官兵皆由特高组从“特务宪兵”中选调组成。营、连、排长都是挂名的，只在必要出场的时候才脱下便衣，穿上军装。班长和士兵因系驻在桂园担任实际警卫工作，必须成天穿上军装，又因我们都留有头发，还必须时刻戴上军帽，以免“现相”。其全班人员的实际级职如下：

警卫班的假级职和姓名	在特高组的实际级职
中校 营长 杨 香	少校组长
上尉 连长 王一峰	准尉组员
中尉 排长 冯若浩	上 士
上士 班长 张宝明	中尉组员
上士 班长 李介新	中尉组员
上 等 兵 罗 伟	中尉组员
上 等 兵 贺 钰 容	少尉组员

此外还有上等兵六人，也都是由宪兵特高组的军士充任。

当时桂园隔壁是美军总部，那里有一个属宪兵第三团的分遣排。我们警卫班自己没有开伙，是在他们那里拿饭，但为了要象一个班的样子，同样配了一个炊事兵（俗称伙夫）。张靖国身材较瘦，背有点驼，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一眼看去很象一个“伙夫”。由于他平时行动迟缓，班内的弟兄，在公开场合，经常大声喊叫“伙夫！”“伙夫！”他心里很不高兴，但不敢开腔，只有到了警卫班住房里才敢发脾气说：“你把老子喊死就安逸了”。

警卫班最初的班长是张宝明，河北人。按照宪兵司令部的规定，警卫宪兵一律不准外出回家，平时只好关在寝室内赌钱消遣。张宝明因管理无方，班内曾经发生争吵。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影响不好，他只当了五天班长就被调回去了。九月二日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当天杨香把我叫到特高组办公地点凤凰台七号“行舍”，先把我过去一段时间的反动成绩作了一番表扬，再问我共产党领袖毛主席由延安来到了重庆，知不知道？然后用命令的方式向我下达任务。

杨香说，毛主席到重庆，总裁（指蒋介石）十分重视，命令司令部组织警卫班。现在处长（警务处亦即情报处少将处长卫持平）命令你担任班长。他还告诉我说，张宝明去搞

了几天搞得不好，已经撤回。要我去之后，对内：在管理上对组员的生活当宽的要宽，工作上当严的要严，坚决不准请假外出。在行动上要执行纪律，对有意违反纪律的，送到处里去关起。对外：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主席。办事要机智，如果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会要你偿命。他特别强调警卫工作关系到党国大事，绝对不能发生差错，让祸事出在宪兵头上。“报告”要力求准确，“窃听”应不着痕迹，尤其是要使共产党人看不出我们这个班是些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杨香还向我说，随同毛主席一起的警卫队长叫龙飞虎，副官是朱友学。对朱副官要接受他的“指挥”，随同毛主席外出，要同龙队长“联系”等等。

杨香说完之后，就叫我到内勤小组去换上宪兵班长的全副军装，并由内勤小组发给我一支白郎林手枪。杨香也到他的办公室去换上中校营长军装，我们一起去到桂园。

这个任务象“七星海椒——辣得很”，搞不好是会掉脑壳的；加之我新婚不久，因而顾虑重重，思想紧张。但在宪兵特高组中象我这样既受过宪兵一般军官训练，又受过特务宪兵训练，具有双重反动资格的人还不太多，在上级决定面前，当然不敢讨价还价，只有硬着头皮去干了。

杨香把我带到桂园，先到班内向内勤宪兵简单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鉴于在前任班长期间，有的人不听管教，杨香特别传达了情报科长周剑心的指示：“如果谁要在这里装怪，一定要从严惩办。”然后把我带去见朱副官，诡称“张班长

生病，现在由李班长来接替。”我向朱副官立正敬礼并说，请朱副官有事找我。朱副官说了一声“李班长”，没有多谈其他的话。当天龙队长随同毛主席外出会客去了，没有见到。

杨香走后，警卫班的内勤宪兵向我详细报告了有关桂园和中共方面跟随毛主席到桂园人员的情况，以及警卫部署，情报内容，交通配备，然后由我带着内勤宪兵对桂园作了一番巡视。根据上级指示，警卫班有事直接向杨香、周剑心报告，为了保密，是借用住在隔壁美军总部宪兵排的军用电话。我把桂园工作初步安排之后，特地前去拜望了美军总部宪兵排排长，以便今后在工作上切取联系。

二、桂园的“警卫”布置

桂园坐落在曾家岩原求精中学（现第六中学）隔壁，门牌中山四路18号，是张治中的“官邸”。房子不大，二楼一底，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中只算中等住宅。进门左侧是传达室，右侧是停车房。大门进去是个小院坝，种有花草。主楼靠右，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楼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院内左角一间小屋是警卫班的住房，面积虽然不大，但可一眼看到桂园全部。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夜间住红岩村。长住桂园的，除警卫班外，还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朱副官和张治中家一个年岁较大的佣人。

警卫班的分工：班长以下，有个内勤宪兵（不站岗，不担任外勤），主要任务是缮写“情报日报”，与特高组的内勤小组约定各种代号、安排交通、领发工作津贴。活动地点在桂园传达室。

桂园门口，经常有一名武装宪兵站岗（毛主席在桂园时，增派一名武装游动宪兵）。另有两名随车宪兵担任毛主席外出的随车警卫工作。伙夫负责按时到隔壁宪兵排去拿饭，并为全班士兵代购生活用品。

门岗宪兵对进入桂园的人员限制很严，除朱副官准许进出的人和介绍给我们认识过的人外，其它人员一律不准进入。住在传达室的内勤宪兵，为了想得到每天来会毛主席客人的具体姓名，从中捞到一点东西，曾经在传达室设一个“会客登记簿”。朱副官知道了，立即指示：“对来客不要登记”。这样一来，有许多来会毛主席的客人，我们并不认识，也无法知道名姓，在填写“情报日报”时只能写上来访时间、客人面貌、体形高矮、大概年岁和显著特征。游动宪兵经常借机靠近楼房，很想能听到点房内的讲话内容，但毛主席会客、办公都在楼上，讲话很难听到。

关于“情报日报”是每天一份，在下午规定时间内写好，由特高组派穿军装的“传达兵”到桂园来取。填日报时约定的暗号：称毛主席为“何先生”，称朱副官为“老吴”。报告的内容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具体写法大致如下：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18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像

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18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18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才慢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到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全很耽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三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象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五时，何先生赴某街某号访×××、×××。接着又赴某街某号访友，不知姓名。回到18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这种“情报日报”送到特高组内勤人员手中，连同其它方面“日报”，择要摘编，呈宪兵司令部立即报告蒋介石。

三、人民领袖，亲切感人

回忆当年我在桂园担任警卫工作期间，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在国民党反共、仇共教育的长期毒害下，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原本抱着许多极其错误的看法。尽管如此，事实胜于雄辩，通过无数日常生活琐事的接触，又不能

不使我们对于人民领袖和共产党人感到尊敬和佩服。

毛主席对人十分和蔼谦虚，亲切感人。不但对来访的客人是这样，对我们警卫人员也是这样。有一次，毛主席送客走到桂园门口返回后，在院子里正碰上值班游动宪兵邱宏泽（他是警卫班年龄最小的一个），毛主席很亲切地问他：“你有多少岁？”邱立正回答：“二十二岁。”还十分关切的问了他是那里人，家庭和上学情况等等。最后毛主席主动伸出手来同邱宏泽握手。真是大出邱的意料之外，他返回警卫班后非常激动地说：“国民党大官，我也见过不少，他们哪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我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同我握手。”从内心深处充分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真诚爱戴和感激。

毛主席每天大约上午八、九点钟来到桂园，下午返回红岩村，一般是在红岩村吃早饭和晚饭。中午有时外出参加宴会，有时在桂园用餐。但桂园既没有特别的厨房设备，也没有配高级厨师，更没有看到他们从市场或附近餐厅买回鸡鸭鱼肉。毛主席在桂园吃饭，是由朱副官和办事处派来的其它警卫队人员用张治中家原有炉灶来做饭。他们上下一致，同甘共苦。

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从来没有到重庆附近的南泉、北泉和其它风景名胜地区游览参观，成天会客访友，非常辛苦。中秋那天，特地送了我们一些月饼、香烟、酒肉，由朱副官叫我去领回。朱副官对我们说：“毛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这点东西表示一点意思。”

周总理经常在桂园办公，有时到曾家岩50号去，往返都

是走路，身体很好，健步如飞。当门岗宪兵向他敬礼时，他总是微笑点头还礼。警卫班的弟兄有时在寝室闲谈说：“国民党的大官总说周恩来厉害，但他对我们当兵的却是很好。”

中共方面随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桂园的其它工作人员，作风诚朴，平等待人，着蓝布中山服，毛主席不在时，总是留在桂园，很少外出。据内勤宪兵告诉我，前任班长张宝明初来时，有事和朱副官联系，习惯于国民党军队里下级对上级的规矩，先说一句：“报告朱副官”。朱副官总是非常谦逊地说：“你们就叫我朱友学吧。”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其它警卫人员，每当毛主席在桂园时，总是三三两两坐在吉普车上看书学习。警卫队队长龙飞虎，身材高大，毛主席每次外出，他们随同毛主席到达哪个地方，就在哪里静坐等候，从不乱走，态度严肃认真。有次由我驾驶三轮机车随同毛主席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警卫队人员坐在大使馆门口休息，我同其它两个宪兵到房屋附近蹓跹；一方面想借此看看动态，一方面是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吸烟（因为武装宪兵不准公开吸烟）。龙队长马上提醒我说：“李班长，来这里最好不要走动。”我原以为这里是外国大使馆，恐怕发生误会，接着就听见里面有狼犬叫声。这时我才向龙队长点头表示真诚感谢。否则，被犬咬伤，也是自己讨得的。

我们在桂园住久之后，每人自觉不自觉的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此以前，国民党总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们看到的共产党人并非如此。相反，孔二小姐在重庆那种横行霸道，荒淫无耻的肮脏丑闻，以及回国

留学生郝贵林报国无门、生活无着，终于吊死在中央公园厕所里头的悲惨遭遇，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发生的。两相比较，使人在思想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提出了许多问号。

四、从李少石事件中受到的教育

十月八日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前夕，张治中在原林森路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给毛主席送行，参加酒会的有国民党的军政首要、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总共好几百人。酒会从下午六点开始，会后有文娱晚会，到九点多钟才结束。

酒会进行中，我们忽然看见周总理和宪兵司令张镇匆匆离去，不久又匆匆回来。周总理面色严肃，我们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酒会和文娱结束，客人都陆续散了，却一直不见毛主席出来。这时龙队长心头也有些着急，问我大礼堂里面的房屋组成和交通情况，并说：“我很想能见到毛主席。即使见不到毛主席，也想能够进去看看。”我知道大礼堂的左侧是通凯旋路的后门，右侧是“最高统帅部”，系国民党最高级军事要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办公、聚会的地方，设有双重警卫。普通宪兵非经特许，也不能进去。在龙队长的敦促下，我只好大胆试试，慢步走到“统帅部”的卫兵旁，自言自语地说：“这样晚了，当大官的还不走。”看见“统帅部”会议室里灯光明亮，有人活动、谈话。

我把这个情况向龙队长说了，以为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直至深夜十一点后，毛主席才同张镇一起出来。毛主席改坐张镇的汽车，由宪兵三轮机车随后护送出军委会，经凯旋路，出通远门，过上清寺，向化龙桥方向驶去。进入红岩村后，停在马路尽头，毛主席同张镇从车上下来，张镇说：“我送毛先生到办事处。”毛主席说：“不必了，太夜深，你请回去。”张镇又说：“那么叫宪兵送毛先生。”毛主席同张镇握手告别。我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直到办事处门口之后才返回原地。我们三轮机车上总共坐了三个人，我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去后，留下一人看守，回来时，留守宪兵对我说：“你们走后，处长（卫持平）、科长（周剑心）、杨香他们都乘吉普车来了，现在红岩村外面，要我们去见他们。”车子开出红岩村门口，果然看见了卫持平、周剑心和宪兵第三团团团长张醴泉、警务团附刘燃围在一起，正在研究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因系陪都，驻有两个宪兵团，即宪兵二十一团，团长吴光运，团部在曹家巷。宪兵三团，团长张醴泉，团部住和平路。小龙坎到较场口一带，包括红岩村在内，是宪三团的管辖范围）。当时张醴泉向卫持平报告说，在红岩村附近住有一个美国顾问，宪兵三团派有一个武装宪兵班住在该处担任警卫。今天下午五时左右，在下土湾方向听到枪声。据当地老百姓讲，下午过了一支押送壮丁的部队，可能是他们开的枪，估计这支部队今晚可能就在小龙坎过夜。卫持平听完张的报告，决定派宪三团警务团附刘燃乘该团三轮机车前往追赶，了解情况。卫持平自己就率领剩

下人员乘车到曾家岩。我开那辆三轮机车，因从军委会送毛主席返回红岩村时，车速太快，久未关灯，灯泡被烧坏了，只得同宪兵司令部开吉普车的司机商量，我没有灯走前面，吉普车走后面，利用吉普车的灯光减速行驶。到达曾家岩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多钟了。

卫持平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一道在曾家岩马路口打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车房，与在场的人共同查看一辆小轿车，看见车后有一个子弹打的孔眼，打开车门，后坐沙发上有很多血。卫持平很想找开车的司机谈话，钱之光说，这部车的司机将车开进车房，锁好车门，把钥匙送到曾家岩五十号，就走了。这个司机是办事处新雇用的，现正在寻找。至此我才明白今天出了一件大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下午由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南开中学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湾时，不幸中弹逝世。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经过，正在调查。我回到桂园临睡之前想到：难怪今晚这样紧张，同时认为今天之后，毛主席一定要休息两天，我也可以轻松一下了。

第二天早晨，大约七点钟，我还没有起床，朱副官就在警卫班门口叫我备车到红岩村办事处去接毛主席。我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开车出发。按照平日惯例，朱副官一般只是通知“备车”，不讲行车地点的。今天不但交待了任务，还通知了开往地点，我马上带着两名宪兵将车从桂园向红岩村驶去。看见从上清寺到红岩村一带沿途都有武装宪兵站岗，我们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专门警戒。

红岩村是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过去我只从大型望远镜中看见过，没有进去过。昨夜护送毛主席到了办事处门口，但因夜深天黑，对内部情况，也没法看清。今天我到达后，说明是朱副官叫我来接毛主席的，他们把我引到会客室休息等候。我的公开身份是武装宪兵，带有手枪，象我这样的特高组人员，公开带着武器，进入共产党的办公处所，并受到善意的接待，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吧。会客室陈设简单，墙上贴有红旗标语。很快毛主席从楼上下来，我走在最前，另一宪兵在最后，到达马路上车。按照以前的行车秩序，我的三轮机车总是走在毛主席的专车后面，今天为了加强警卫，我的三轮机车第一次开在毛主席专车前面，沿途站岗执勤的武装宪兵，看见我驶过，也就知道毛主席来了，等到毛主席专车过去，他们始得撤除警戒。

自此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那天出的事情真是重大。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秘书，在下土湾中弹之后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经多方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逝世。斯时，周总理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加张治中举行的欢送酒会，闻讯赶到，抚尸痛哭，无限悲愤。杨香说，这件事发生后，因为真相不明，周总理责令张镇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镇非常紧张。国民党害怕中共方面借此扩大事态，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始知事情的经过是：八日下午五时过后，李少石乘车返城途中，车行很快。行至下土湾时，适有陆军重迫击炮团的一个排长率领六名带枪的正副班长和三十名新兵由重庆向璧

山方向行进，其中有一个士兵正在路旁小便，汽车驰至时躲避不及，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伤。肇事之后，司机因未察觉，没有停车；该排的一个班长鸣枪警告，恰好子弹从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李少石右侧肩胛入肺部。该司机见李中弹，紧急驱车送至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七点多钟逝世。

这件事情与司机固然有一定关系，但李少石的不幸致死，是国民党部队开枪造成的。消息传出，山城震动。中外人士都认为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非常愤慨。当晚这支国民党部队临时住宿小龙坎松鹤楼饭店，已把受伤士兵送到高滩岩原中央医院医治去了。后来知道惹了大祸，国民党方面害怕事态扩大，另生枝节，竟不顾受伤士兵的痛苦，用汽车将他搬到金汤街市民医院，住在李少石原住病房对面，任人参观，安心“扯皮”。

中共方面一本实事求是精神，抓紧调查事情真相。把原因弄清后，首先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伪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情经过的谈话，接着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谈话。钱之光处长的谈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而且还对国民党军政当局迅速抓紧调查，表示感谢；对被汽车撞伤的国民党士兵表示慰问，全部医疗费用一概由中共方面承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还在安葬李少石之后，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国民党士兵，瞩其安心治疗，重申一切医疗费用全部由共产党负责。而国民党《中央日报》只是刊登了张镇的谈话，对钱之光处长的谈话则只字

不提。两相比较，我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五、毛主席同我握手

十月十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桂园签字。后来听说时间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只见来了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的大官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总理与王若飞。没有通知新闻记者和其它有关人士参加。签字之后，蒋介石来桂园拜会毛主席。蒋介石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佩剑。毛主席在楼房阶檐口同他握手，一同走进楼下会客室。蒋介石装模作样地坐在沙发上，端起茶碗故作姿态，用茶盖把茶叶翻了几下就放下了。大约坐了十多分钟，就和毛主席一道坐上汽车到原国府路（现人民路）国民政府，参加双十节招待会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回到桂园，稍事休息，便乘车从桂园出发，经小龙坎、新桥、山洞直达林园蒋介石的公馆。林园警卫森严，一般随车宪兵是不能入内的。我所坐的三轮机车只能停放在林园对门50公尺以外的马路边静坐等候。当时，关于毛主席第二天就要返回延安的事，宪兵司令部事前没有通知我们，我还以为毛主席是来参加蒋介石的晚宴，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动静。林园一带既无茶馆，也无饭店，我们既未吃饭，也未喝水，只好硬着头皮去接近卫兵，说明我们是警卫毛主席的宪兵，要点水喝；外面雾大、天冷，请求到屋里坐坐。卫兵连说：“不行”！“不行”！

根本不理不睬。我们只得满腹怨气，在那里又冷、又饿的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听见林园内的汽车开动声，就立即作好准备，紧紧护送毛主席去九龙坡飞机场。

从林园出发共有三部汽车，乘坐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国民党的陈诚。毛主席到达九龙坡机场时，民主人士张澜等人已在机场等候。王炳南站毛主席身旁，介绍毛主席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我是担任警戒任务，离毛主席较远，王炳南特地向毛主席指着我说：“这是班长”。我快步上前向毛主席立正敬礼，毛主席同我握手，十分亲切地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一股暖流冲溢全身，使我又是惊奇，又是惭愧。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在离开重庆前还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宪兵班长”握手告别，我心里真是无限高兴，无限感慨！

从九龙坡机场回到桂园，朱副官告诉我：“今天下午周总理请营长、连长、排长和全班人吃饭”。又说，毛主席送了我们一些东西，叫我去领。我马上到隔壁美军总部打电话向杨香报告，杨香要我作好当晚撤回的准备。

下午五时，杨香带着假装的连长、排长来了。宴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共同进餐的还有张治中看家的人。席间周总理向杨香表示了感谢的意思，“连长”为人尖滑，空话连篇；“排长”是广西人，不会说普通话，一言不发，使人忍俊不禁，真象做戏一般。

周总理还问到张治中家属情况，看房的人回答说：“儿子在美国，结婚后已给张部长添了一个孙儿，张部长很高

兴”。并立即取来相片，周总理看后点头微笑。饭后，杨香叫我把全班集合，请周总理训话，周总理说：“大家辛苦了”。

朱副官把我叫到他的住处，桌上已放好一堆西北毛线，一套西北呢料，我将这些东西搬出，放在三轮机车内。杨香同“连长”、“排长”乘坐三轮机车先走，我率领全班步行，离开桂园返凤凰台七号“行舍”。杨香对毛主席送的东西，提出了三个处理方案，一是不收，一是收一半，一是全收。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答复：“全收”。西北呢料只有一套，由杨香得，西北毛线十几磅，所有在桂园工作过的人，每人分得一磅，大家都很高兴，庆幸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重大“警卫”任务。我把分得的毛线，打成毛衣，十分爱护，一直穿到重庆解放之后。

时间过得真快，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已经三十多年了。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已经彻底灭亡。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原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本文选用时有删节)

封面
目录
正文